

# 烏魚、土魷、虱目魚： 多元脈絡下荷治至清領初期 臺灣三種特色海產的確立

鄭維中\*

## 摘 要

十八世紀初期，清帝國的方誌書寫中，將「烏魚、土魷、虱目魚」採錄為三種臺灣本地特色海產。本文嘗試探討這三種海產，如何在臺灣多元的歷史脈絡下，於清帝國治理臺灣之初，發展為臺灣本地墾殖者所共認共享的本土特色海產。

本文所稱的多元脈絡，包括（1）以烏魚漁業為例，說明荷蘭東印度公司至鄭氏東寧政權治臺時期，唐人經營之漁業，由「異地漁業」向「本地漁業」轉化的本土化過程；（2）以土魷為例，說明並考證荷語「國王魚」一詞涵蓋「土魷」在內，並說明透過同時期荷治下大員地區「殖民交會」的影響，唐人接納外語魚名及消費習慣的狀況；（3）以虱目魚為例，提出其命名及養殖技術的引進，可能與東寧政權和爪哇地區的往來有關。

綜上，本文指出，荷人治臺，引進唐人移民，擴大了臺灣本地消費市場，是推進「本地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居住於熱蘭遮城市鎮中的唐人市民，因與荷蘭人共享漁產消費，也接納了外語魚名與煮食方式。東寧時期自爪哇引進半鹹水養殖技術，則為以上兩種脈絡之共同延續。即便臺灣在納入清帝國統治之後，原先多元的歷史脈絡被刻意忽視，但其痕跡，卻意外地透過特色海產的形塑過程，在清帝國的方誌書寫中，被保留下來。

**關鍵詞：**烏魚、土魷、虱目魚、殖民交會、異地漁業

---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8 年 2 月 5 日；通過刊登：2018 年 5 月 19 日。

- 一、導論：異地漁業與殖民交會
  - 二、作為異地漁業的烏魚漁業
  - 三、殖民交會下誕生的土魷俗名
  - 四、東洋針路末端的虱目魚養殖
  - 五、結論：三種臺灣特色海產的確立
- 

## 一、導論：異地漁業與殖民交會

在早期臺灣史的發展中，福建漁民的活動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殖民擴張，兩者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針對臺灣近海及烏魚、土魷漁業，荷蘭政府原本採取「(唐人跨海)異地漁業(migratory fishery)」<sup>1</sup>的管理方針(詳下文)，無意發展本地漁業。但卻因農墾活動的推動，帶來了移民，造成本地漁產市場需求的擴大。在此脈絡下，展開了本地漁業發展烏魚、土魷漁業的契機。

在鄭氏政權取代荷蘭政權，控制了東寧(今臺灣西南沿岸)後，由於與中國大陸隔絕，其漁業政策不得不由「異地漁業」朝「本地漁業(residential fishery)」轉換。由於鄭氏與東南亞各國間多所交涉，又發展出不同於華南地區的虱目魚養殖漁業風貌。清領之後，在1717年刊行的《諸羅縣志》中，評價臺灣為「多烏、多塗魷、麻虱目」之地，將此三者視為臺灣海產的特色。<sup>2</sup>

本文即針對此三種海產，企圖釐清早期福建唐人跨海發展出的異地漁業，在歷經與歐洲人互動的殖民交會(colonial encounter)後，如何在產業本地化的過

---

<sup>1</sup> 異地漁業(migratory fishery)指十六世紀起歐洲各國漁民，由大西洋東岸向西跨越3,200公里，前往紐芬蘭海域所進行的季節性漁業，主要是撈捕鮭魚與鱈魚。參見 Joseph R. Smallwood and Robert D.W. Pitt, eds., *Encyclopedia of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Vol. 2 (St. John's, Nfld.: Newfoundland Book Publishers, 1984), pp. 132-133, "The Migratory Fishery".

<sup>2</sup> 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諸羅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367。同條尚有「多紅蝦、各陂圳多鮎。」但由於「鮎」為淡水水產，「紅蝦」不具地方色彩，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程中，接納、保留了某些外來的因素，最終於清領初期，被普遍認可為臺灣本地特色海產的過程。<sup>3</sup>

本文參考近年來國際漁業史與生態史的成果，以及臺灣史學界過去相關的研究，對於不同的魚種，分別採取不同的研究取徑。以下首先將分頭簡介國際漁業史與生態史的研究潮流，說明其與本文的關連性。其後，則進一步說明臺灣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以及本文如何繼承並發展之。

2014年，德國海洋史學家 Ingo Heidbrink 曾對歷來《海洋史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所刊出的漁業研究加以評論。他認為，二十世紀前半的漁業史研究，多半侷限在地方史研究的範圍，少有分析性的見解。但在 1990 年代之後，漁業史的研究可大分為兩個主流，研究主題早於十九世紀者，多為傳統經濟史的延伸發展；其餘的研究，則為環境史學者在 1970 年代起，海洋漁業資源枯竭刺激下，開創出的全球漁業史研究。此種研究，多將討論起點設置於漁業工業化發端的十九世紀中期。<sup>4</sup>

關於後者，與本文有關的，目前已有一些東南亞、東北亞以及與臺灣相關的研究成果浮現。<sup>5</sup> 此外，在歐美地區，有關北大西洋漁業方面的研究，不勝枚舉，但與本文較不相關，於此不冗文贅述。至於前面一種，有關十九世紀之前的歷史研究潮流，主要還是討論近代早期西歐資本主義誕生與漁業的關連，其大部分內涵，無論就時空或論旨，都與本文相去甚遠。<sup>6</sup>

<sup>3</sup> 本文所稱唐人過去也曾用「漢人」稱之。由於十七世紀臺灣唐人移民仍未取得對本地的支配權，而臺灣島之景象與發展狀況與東南亞各地相似，故採取此一寫法。此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陳宗仁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之「21世紀亞太區域研究挑戰與希望工作坊」（2017年4月28日）口頭報告〈唐人與東西洋的研究回顧與展望〉時，所提出之主張。又如王士禛（1634-1711）於《居易錄》中亦記載「臺灣多番民，呼中國人曰唐人，亦如荷蘭暹羅之謂唐人也。」參見王士禛，《居易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9，頁14。

<sup>4</sup> Ingo Heidbrink, "Whaling, Fisheries and Marin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 John's, Nfld.) 26: 1 (Feb. 2014), p. 117.

<sup>5</sup> John G. Butcher, *The Closing of the Frontier: A History of the Marine Fisheries of Southeast Asia c. 1850-2000*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4); Micah S. Muscolino, *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Henry T. Chen, *Taiwanese Distant-Water Fisheries in Southeast Asia, 1936-1977* (St. John's, Nfl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 2009).

<sup>6</sup> 關於這一部分內容的淺介，參見 Louis Sicking,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 John's, Nfld.) 15: 2 (Dec. 2003), pp. 159-162.

惟筆者仍須指出，諸多對西歐漁業市場化與早期都市化發展的經濟史研究，催生了不少關注十六世紀以來，西歐各國於波羅的海撈捕鯡魚，或在紐芬蘭（Newfoundland）附近北大西洋撈捕鮭魚、鱈魚，所謂「異地漁業（migratory fishery）」的研究成果，<sup>7</sup> 對本文深具啟發性。由於早期中國大陸沿海的唐人漁民，從福建跨出國境，前往臺灣近海撈捕漁產，也能被視為是一種「異地漁業」的發展。故本文第二節，也將由此類研究汲取經驗，嘗試以異地漁業的角度，針對烏魚的撈捕與消費，勾勒出荷蘭統治前後臺灣漁業的發展梗概。值得注意的是，此種西歐「異地漁業」的觀察角度，雖與早期臺灣漁業發展間，具備可比性，但卻缺乏異文化交流之因素，與臺灣經驗相異。

在美國歷史學者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提出「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此一生態史觀點後，科學史社群逐漸開始關切歐洲擴張（European expansion）後，人與自然關係的變化。<sup>8</sup> 此類研究導向，近來也開始關注在異文化接觸的脈絡下，各種原本歐洲人與本地人所不認識的生物，是如何被命名、接納並利用，其後，又產生何種後續影響。這種包含了異文化接觸的科學史觀點，則是本文在第三、四節所採納的研究取徑。

過去臺灣史的研究前輩，如中村孝志、曹永和兩位學者，曾運用荷蘭統治時期之檔案文獻，從事此一時期臺灣漁業史的研究。如依以上簡短的學術史回顧看來，中村孝志的研究，比較類似於二十世紀前期所流行的，地方史脈絡下的漁業研究，著重於探討荷蘭統治當局對漁業的獎勵、管理，以及其所達成的業績。而曹永和的研究，由唐人漁民的實際漁撈活動出發，也探討臺灣相關產業的發展，雖可歸屬於「漢人開發史」脈絡，究其內涵，則與前述「異地漁業」研究類似。<sup>9</sup>

---

<sup>7</sup> Louis Sicking and Darlene Abreu-Ferreira, eds., *Beyond the Catch: Fisherie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he North Sea and the Baltic, 900-1850* (Leiden; Boston: Brill, 2009).

<sup>8</sup> 例如 Miguel de Asúa and Roger French, *A New World of Animals: Early Modern Europeans on the Creatures of Iberian America*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5); Abel A. Alves, *The Animals of Spain: An Introduction to Imperial Perceptions and Human Interaction with Other Animals, 1492-1826* (Leiden; Boston: Brill, 2011); Martha Few and Zeb Tortorici, eds., *Centering Animals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up>9</sup> 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9），頁 157-174；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補說〉，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175-254；中村孝志，〈荷蘭時代臺灣南部之鰻漁業〉，收於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臺北：稻鄉出版社，1997），頁 121-142；中村孝

其後，韓家寶（Pol Heyns）在其對荷治時期稅務的研究中，進行了漁業稅的討論；<sup>10</sup> 楊博任則在碩論中，詳密地運用了漢譯荷蘭文獻，特別是以《熱蘭遮城日誌》深化了過去中村孝志與曹永和關於臺灣荷治時期漁業的研究。<sup>11</sup> 近年來，由於魚類俗名考證受到重視，又有飲食史研究的勃興，翁佳音、曾品滄等另闢蹊徑，相繼發表有關臺灣魚類俗名與漁業發展的研究成果。<sup>12</sup> 翁佳音的考證，觸及了異文化交會的複雜問題，惜未由前述科學史的角度，做出深入探討。而曾品滄的研究，綜合了豐富的文獻與田野調查資料，但由於其研究的時代設定較本篇為晚，故未曾細論歐洲擴張與唐人移民的背景，亦不著重魚名的源流。

是以，筆者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追隨晚近國際漁業史與科學史研究的潮流，採取多語言文獻互證的方法，運用荷蘭語已刊及未刊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包括航海日誌、督察官日誌、海岸調查報告、熱蘭遮城議會決議錄、派發給艦隊或士兵的指令）、荷蘭與英國私人遊記、自然史調查的紀錄、漢文方志、日本博物學者記載等，來從事漁產俗名、漁業與食用方式的研究。以此延續並補充、修正前人的成果，期待釐清三種魚類被認定為臺灣特色海產的曲折歷史過程，以呈現臺灣移民社會在形成初始，即已具備涵蓋多元文化的產業與飲食特性。

## 二、作為異地漁業的烏魚漁業

針對荷蘭統治時期的烏魚撈捕，中村孝志及曹永和兩人已有詳論，其研究成果包括漁稅、漁場、漁季、撈捕數量等，頗為細緻透徹。曹永和的研究，特別關

---

志，〈臺灣南部鱷漁業再論〉，收於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143-164。

<sup>10</sup> 韓家寶（Pol Heyns）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2）。

<sup>11</sup> 楊博任，〈荷治時期臺灣的漁業〉（臺南：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sup>12</sup> 翁佳音，〈國王魚（Kingfish）的故事〉，《歷史月刊》（臺北）248（2008年9月），頁23-27；曾品滄，〈塹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臺北）19: 4（2012年12月），頁1-47；陳玉箴、曾品滄、李瑞源、吳庭宇，〈台江地區文史資源調查及應用規劃研究（四）：台江飲食文化源流成果報告書〉（2015年12月），《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下載日期：2018年5月31日，網址：<https://www.tjnp.gov.tw/FileDownload/Result/20160219115504049606.pdf>；郭忠豪，〈技術、品味與土魷魚：大高雄土魷魚的歷史變遷與品饌文化〉，《高雄文獻》（高雄）4: 1（2014年4月），頁28-54。

注唐人漁民因捕魚進入臺灣沿岸的情形；而關於捕烏的漁季、來航數量、徵稅辦法、漁場治理與監視等，中村孝志之研究，幾已達鉅細靡遺程度。繼之，又有韓家寶提出歷年徵稅情況與數額、楊博任細數漁產品登記種類與數量研究，相關研究成果，可說已經粲然大備。

惟曹永和曾推測，既然最初與原住民從事交易的是前來臺灣的漁民，此時期進入臺灣的唐人移民，應該是先在漁場附近建立漁寮，然後發展為漁村而定居。定居之後，則可能在漁期之外，兼營農業，以為生計。換言之，曹永和認為臺灣漁業的發展，是先由福建漁民前往臺灣沿海作業的「異地漁業」開始，逐漸落地生根，而逐步發展成「本地漁業」。這樣的研究，不僅是在勾勒漁業管理發展的脈絡，更試圖藉由漁業研究，探討早期臺灣漁業發展與墾殖事業間的關連。曹永和此一推測，儘管合理，卻未曾在荷蘭檔案中發現適當的證據，來充分檢驗。<sup>13</sup> 在此，筆者將針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捕烏漁民的活動情況，與其是否移居臺灣，略做考察，以檢驗曹永和關於漁民（特別是捕烏漁民）移居臺灣的研究假設。

前述中村與曹氏之研究已經解明，當時捕烏最重要的漁場位於打狗（今高雄）、堯港（今高雄市茄萣區至彌陀區沿海）、下淡水溪沿岸。漁民是否落地定居，顯然與其是否登岸活動有關。若需辨明當時捕烏漁民是否登陸過夜，則必須從他們如何過夜來追蹤探討。本文將藉由荷蘭檔案的記載，推敲實際的情況。

1637年11月29日，荷蘭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范德勃格（Johan van der Burch，1636-1640年間在臺任職）結束其於放線村社（今屏東縣林邊鄉）的訪視後，搭船回航安平。他所率領3艘船隻的航行路線，正好經過了前述的烏魚漁場。30日傍晚，3艘船隻於旗後山南方海灣（今旗後海水浴場沙灘外）下錨，<sup>14</sup> 范德勃格乘舢舨，進入打狗灣澳從事測量。有感於唐人的捕烏漁船經常在此灣澳避風，他遂提議，應於此地建立城寨，以遏阻唐人海盜藉此灣澳登陸滋擾。此提議在提出兩年之後，遭到了督察官庫克巴卡（Nicolaes Couckerbacker，1639年巡察臺灣與越南東京商館）的否決。庫克巴卡也曾親身視察過預備設立城寨的地點，他發現，打狗灣澳的出入口水道雖深，水面也算開闊，但灣澳內部具備足夠水深

<sup>13</sup> 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補說〉，頁249-251。

<sup>14</sup> VOC 1128, Het journael gehouden op den tocht bij den gouverneur Jan van der Burch zedert 26 November 1637 tot 1 December 1637 met een crijchsmacht van 140 zoldaten naer Pangsoija ende Lameij, Pansoija enz. (26 Nov. 1637-1 Dec. 1637), fo. 445. 30 Nov. 1637.

的泊碇區域卻很狹窄，他斷言：

此處只能容得 2 到 3 艘小型的快船（jacht）來泊碇。因為，我們的快船，吃水遠較唐人漁民的木船為深。<sup>15</sup>

在庫克巴卡後來呈交給巴達維亞上級的報告書中，對此有更詳細的描述。他所謂的小型快船，大概是可以乘載 50 到 60 拉司特（last，合計約 100 到 120 公噸）的荷蘭船隻。<sup>16</sup> 在當時，僅有小布列達美號（Cleen Bredamme）跟瓦特盧斯非佛號（Waterloose Werve）兩艘荷蘭快船能安全進入打狗的入港水道，這兩艘船載重各自為 60 與 36 拉司特。<sup>17</sup> 曹永和指出，大小不同的快船，吃水深大約在 8 到 13.5 荷呎（2.4 到 4.05 米）之間。<sup>18</sup> 如當時大部分停泊於打狗灣澳的唐人漁船，不會受到水淺限制的話，其吃水深度應該少於 2.4 米。曹永和又指出，唐人漁船的裝載量雖有到 10.5 拉司特者，多半卻只達 2-4 拉司特（4-8 公噸）左右。<sup>19</sup> 既然唐人漁船的形制規模小，與荷蘭快船相比，約在其 1/5 到 1/30 之間，顯然他們在此灣澳內所能停泊的水域範圍，遠比荷蘭人要廣。

<sup>15</sup> VOC 1131, Dachregister gehouden op de vojagie van de E. Nicolaes Couckebacker, gewesene president ende opperhoofd van 's Compagnies negotie in het rijck van Japan, gaende per de jachten Lis ene Waterloose Werff in qualite van commissaris aen de coninck van Tonquijn, mitsgaders van daer in deselve qualite tot de visite des Comptoirs ende vordere Compagnies ommeslach tot Tayouan, gelegen op het eijlant Formosa, seijlende van Batavia naer Tayouan, Batavia enz. (16 Junij 1639-7 Dec. 1639), fos. 388-389. 26-28 Sept. 1639.

<sup>16</sup> VOC 1131, Rapport [van Nicolaes Couckebacker]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el Anthonio van Diemen ende de raeden van India, nopende Couckebacker's besendinge naer Tonckin ende gedaene visite des Comptoirs ende verderen ommeslag uijt Tayouan, gelegen op het eijlandt Formosa, on fluitship de Rijp (8 Dec. 1639), fo. 279. 部分內容亦載於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1629-1641》（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0），頁 453，1639 年 9 月 28 日條。

<sup>17</sup> VOC 1131, Rapport [van Nicolaes Couckebacker]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el Anthonio van Diemen ende de raeden van India, nopende Couckebacker's besendinge naer Tonckin ende gedaene visite des Comptoirs ende verderen ommeslag uijt Tayouan, gelegen op het eijlandt Formosa, on fluitship de Rijp (8 Dec. 1639), fo. 293；中村孝志，〈荷蘭時代臺灣南部之鱷漁業〉，頁 128。

<sup>18</sup> 曹永和著、陳宗仁校註，《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航》（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11），頁 236。本文因使用英呎與荷呎兩種度量，文中均會特別標示。而荷呎若以阿姆斯特丹呎計，則為 28 公分。若以萊茵呎計，則為 31 公分。參見 Judith Schooneveld-Oosterling and Marc Kooijmans, *VOC-glossarium: Verklaring van termen, verzameld uit de RGP-publicaties die betrekking hebben op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hiedenis, 2000), p. 122.

<sup>19</sup> 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補說〉，頁 232。

又根據臺灣長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1629-1636 年間在臺任職）所彙整的〈臺灣西海岸描述〉，堯港瀉湖水深，僅有 5-6 荷呎（1.5-1.8 公尺），只有唐人小舟得以進出。<sup>20</sup> 可見，停泊堯港的唐人漁舟，吃水約在 1 公尺以下。唐人每年來訪臺灣捕烏，約有 80-100 隻漁船。<sup>21</sup> 筆者推測，在漁期中，應都能駛入堯港、打狗澳的瀉湖停泊過夜。吃水淺者，有廣大的瀉湖可以停泊，而吃水稍深者，則往荷蘭船隻可停泊的區域靠攏即可。

即便大量唐人漁船年年在此泊碇，庫克巴卡督察官卻仍以大型船隻無法入港為由，否決了設防的必要。筆者推測，他可能認為，依靠一大群蜂屯蟻聚的小船，根本無法一次送交大量兵員上岸。是故，打狗灣澳沒有被據以為登陸灘頭的風險。既然如此，即便設置了永久駐站以監視漁船，也不必浪費預算，建築堅固城寨來保護駐站崗哨。再者，他也認為，要將假想敵阻於灘頭，只要依賴當地原住民的力量即可。<sup>22</sup>

過去，在荷蘭人未曾進入大員（今安平古堡及其周邊地帶）地區之前，唐人漁民於原住民村落寄宿的情況，頗為頻繁。<sup>23</sup> 但隨著荷蘭人在大員立定腳跟、擴展勢力，逐漸將本地唐人納入管理後，當局自 1640 年代起，陸續頒布了區域隔

<sup>20</sup> Collectie Aanwinsten 119 (1866 A XII), Beschrijvinghe van de west cust van Formosa de cust van China en Pehu ofte pescadoves, met haere rivieren, baijen, diepten, droochten clippen, droogten segge coursen, hoochten ende inhammen, alles door verscheijden ervaeren stuerluiden deertoe expresselijck gecommiteerte, durende het gouvernement van E. Hans Putmans ondersocht en bevonden, fos. 269-285. 此一海岸敘述標題總名稱為〈福爾摩沙西岸、中國海岸與澎湖的描述，包括其河流、海灣、水深、淺礁岩、淺灘；航行水道、緯度及河口，全部由在普特曼斯長官任內所任命數位經驗豐富的舵手所調查完成〉。關於此一報告的內涵與其彙整的經過，參見鄭維中，〈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在臺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1622-1636）〉，收於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8），頁 385-440。

<sup>21</sup> 這是 1662 年時巴達維亞當局綜合歷年的經驗所提出的概括說法。參見 VOC 886, Instructie [van Joan Maetsuijcker] voor den commandeur Balthasar Bort ende den raedt gaende van hier met een aensienelijke scheeps- en krijgsmacht naer de custe van China, omme den Chinesen rover Coxinja allerwegen te vervolgen en hem soo te waeter als te lande allen mogelijcken afbreuck te doen, Batavia (21 Junij 1662), fo. 159；楊博任則認為平均總數通常超過 100 艘。參見楊博任，〈荷治時期臺灣的漁業〉，頁 77。

<sup>22</sup> VOC 1163, Instructie van Pieter Antonissen Overwater voor den oppercoopman Roeloff Sievertsz., vertrekkende van hier met een gehuurde Chinese joncke naer de zijdt van Formosa om de vissers in het vaerwater aldaer te visiteren, waernaer sich in het uijtveren van dien sal hebben te richten, Taiwan (17 Dec. 1646), fos. 343-344.

<sup>23</sup> Leonard Blussé, Natalie Everts, and Evelien French,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 I: 1623-1635*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1999), p. 29.

離的措施，阻止唐人進入原住民村落居住、貿易。1642年，荷蘭人將西班牙人逐出北臺灣，獲取並固守了雞籠、淡水兩處相對適合大型船隻停泊的口岸後，便開始掃蕩臺灣西部沿岸，阻止唐人漁民於海岸地帶居住。在經由臺灣西部沿岸，聯絡南北駐地的航路開通之後，荷蘭當局對於海岸地帶之控制也更趨嚴格：

我們發現，有些唐人船隻藉口遭風漂流到附近，向尚未給付稅款的漁民收購烏魚。如此一來，輸出到中國的烏魚便免於向公司納稅。為了對此加以控制，我們在每一處漁場泊碇處的水道入口公告，若未曾先申領執照者，不得於漁場泊碇，更不能從事撈捕，也不能與原住民交易。他們應當避免與原住民接觸，也不得前往村落房舍。他們必須承諾，不在離岸一荷哩（7.407公里）的範圍內，搭蓋任何房舍。

我們經常聽聞唐人如何在福爾摩沙人面前，惡劣地醜化我們，麻痺他們的感覺，煽動他們與我們開戰，正如同許多實例所證明的一樣。為了解決此事，並使原住民更傾向我方，我們決定在南北各地都施行禁止唐人居留的辦法，除那些從事最重要生意的人以外（例如在淡水收購硫磺、買賣米鹽、設陷阱捕鹿的獵人）。<sup>24</sup>

因此，在大員以南的各個沿岸潟湖，當局雖然容許唐人的捕烏漁船停泊，卻不許他們在岸上設立任何房舍、占有任何土地。大員當局又在1643年9月議決，將不許任何領有捕烏執照的船隻，駛入河川上游進行撈捕作業。考慮到撈捕烏魚主要漁場所在，此一決定，顯然是針對下淡水溪而為。<sup>25</sup>事實上，在殘留的檔案中，確實留存有發給士兵，任命他們駛入下淡水溪，發動巡緝的命令，可做為旁證。<sup>26</sup>

而在北線尾（今臺南市安南區北汕尾），可能因為距離原住民村落較遠、且

---

<sup>24</sup> VOC 1145, Missive van den president Maximiliaen Le Maire naer Batavia aen Anthonio van Diemen, Taiwan (9 Dec. 1643), fos. 207<sup>v</sup>-208<sup>f</sup>.

<sup>25</sup> VOC 1145, Resolutiën bij den president Maximiliaen Le Maire ende den raedt des Casteel Zeelandia geresolveert, beginnende den 1ste Maert ende eijndigende den 9e October 1643, Taiwan (1 Mar. 1643-9 Oct. 1643), fo. 465<sup>f</sup>. 25 Sept. 1643.

<sup>26</sup> VOC 1163, Instructie van Pieter Antonissen Overwater voor den oppercoopman Roeloff Sievertsz., vertrekkende van hier met een gehuurde Chinese joncke naer de zijdt van Formosa om de vissers in het vaerwater aldaer te visiteren, waernaer sich in het uijtveren van dien sal hebben te richten, Taiwan (17 Dec. 1646), fos. 343-344.

有台江內海橫隔，而在安平熱蘭遮城即可瞭望監視之，所以容許漁民搭蓋漁寮，方便其登岸納稅。<sup>27</sup> 在北線尾中段，已有海堡監視之，情況類似。但其北段，於鹿耳門（位於臺南市安南區，確實地點仍有爭議）處，則無設防。由於駛回中國的船隻若渡海失敗，未能抵達澎湖時，多折回鹿耳門候風。既然他們聲稱準備離開，便不會再駛入大員港重複納稅，而是逕自再啟程。但在他們停留候風時，可私下取得漁獲，造成走私烏魚的漏洞。為防堵此一漏洞，公司當局於1646年起，加派士兵監視。<sup>28</sup>

由此向北，在魷港（一般多認為位於今嘉義縣布袋鎮）附近的瀉湖與河口，也已築有芙列辛根堡監視。<sup>29</sup> 而魷港以北到二林的海岸，當時海岸沙灘的範圍，多有超過1 荷哩者，且多半是潮汐堆積的地形，亦不會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定居。海岸之後向北延伸，接連至 Vavorolang（有譯為「虎尾壟」）區域、Quataong（有譯為「大肚王」）轄地之海岸線，也都是沙灘沉降地形，無須監控，理由同上。<sup>30</sup> 再延伸過去，直到淡水河的海岸，其河口、灣澳則仍劃定為漁場。荷蘭當局一面派人搭小舟來回巡曳海岸，遏阻任何未曾申領執照的唐人漁船接近，一面要求此一區域的賤商，不許於原住民村社當中居住，而須在每日生意完結後，退回到河中的小舟上，或在沙灘上過夜。<sup>31</sup> 例如1646年4月，臺灣長官卡隆（François Caron，

<sup>27</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4冊：1655-1662》（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1），頁137，1656年10月8日條，記載北線尾沙洲上面曾有三處漁村，但當日已為風災所毀。北線尾沙洲自何時起即有漁民居留，筆者尚不甚確定。惟1635年左右的海圖已有標示。參見歐陽泰（Tonio Andrade）著、陳信宏譯，《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56。

<sup>28</sup> VOC 1145, Resolutiën bij den president Maximiliaen Le Maire ende den raedt des Casteel Zeelandia geresolveert, beginnende den 1ste Maert ende eindigende den 9e October 1643, Taiwan (1 Mar. 1643-9 Oct. 1643), fo. 433. 15 Mar. 1643; VOC 1163, Ordre van Antonissen Overtwater voor den corporael van de Adelborsten Hendrick Stalman, leggende met elf soldaten aen Lacquemuij omme des Compagnies visthienden gedurijrende de maenden December en Januarij te ontfangen als wel meer omme de Chinesen bedriegerijen soo veel doenelijck voor te comen, Taiwan (17 Dec. 1646), fo. 341. 《熱蘭遮城日誌》中雖無詳述設防原因，但亦逐年記錄其設防情況。參見楊博任，〈荷治時期臺灣的漁業〉，頁26。

<sup>29</sup> 格斯·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解說，《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臺北：漢聲雜誌社，1997），下冊，頁68。

<sup>30</sup> Wei-chung Cheng, "Sailing from the China Coast to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semblances in Chinese and Dutch Sailing Pattern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EFEO)* (Paris) 101 (2015), p. 319.

<sup>31</sup> VOC 1160, Instructie van Façois Caron voor den sergeant Gerrit Casman, vertrekkende van hier per een Chinese jonckje naer de revieren welck om de noordt tusschen Tamsuij ende de landtstreke van de Quat-

1644-1646 年間任職臺灣）發給士官卡斯曼（Gerrit Casman）的命令便稱：

……正如我們多次於告令中指出，賈商必須在河流或沙灘的指定地點居留，白天才可進入所賈得的村落去進行交易，夜晚則不許進入。其他地方的原住民，也要帶他們的貨物到這個地點交易，任何情況下都不許違反。<sup>32</sup>

故在 1644 年之後，荷蘭人淨空海岸的政策逐步落實。原先唐人漁民在海岸短期居留，乃至於有少數人開始定居的動向，也無由繼續發生。非但由大陸沿岸而來的唐人漁民，沒有機會安家落戶，這些漁民有時甚至會面臨在赤崁（此處指以今臺南市赤崁樓向北、東、南三方延伸的地域，其範圍仍待細緻研究）耕作的唐人農工的競爭。1646 年，當局派出掌旗官威爾斯（Reciard Wils）前去堯港，查緝走私烏魚的命令，記載內容如下：

去年（1645）我們派遣一位舵手、幾位水手和收稅員一同前去[堯港]，他們報告說，許多公司仔（即唐人農工），離開、厭棄他們主人的耕地，到那裡去賺取撈捕烏魚的利益。他們沒有繳納什一漁稅，而收入可供他們整年生計。本年（1646）（特別是因為[中國受到]戰爭的影響，很少船隻前來捕烏）也是這樣。<sup>33</sup>

又根據收稅員的報導，1645 年有很多漁獲，從堯港瀉湖的內側陸地，經由陸路輸運到各處，因此避開了瀉湖出口的查緝人員。<sup>34</sup> 檔案中的一些記載，確實能

---

aongh liggen, sijnde nu onlanghs aen diverse Chineesen door d' E Compagnie verpacht; waernaer sich in 't uijtvoeren van dese ons ordre sal hebben te gedragen, Taiwan (25 April 1646), fo. 194.

<sup>32</sup> VOC 1160, Instructie van Fañçois Caron voor den sergeant Gerrit Casman, vertrekkende van hier per een Chinese jonckje naer de revieren welck om de noordt tusschen Tamsuij ende de landtstreke van de Quataongh liggen, sijnde nu onlanghs aen diverse Chineesen door d' E Compagnie verpacht; waernaer sich in 't uijtvoeren van dese ons ordre sal hebben te gedragen, Taiwan (25 April 1646), fo. 195. 此指令適用於由淡水到 Quataongh（有譯為「大肚番王」）轄區之間的地域。

<sup>33</sup> VOC 1163, Ordre van Antonissen Overtwater voor den corporael van de Adalborsten Hendrick Stalman, leggende met elf soldaten aen Lacquemuij omme des Compagnies visthienden gedurijrdende de maenden December en Januarij te ontfangen als wel meer omme de Chinesen bedriegerijen soo veel doenelijck voor te comen, Taiwan (17 Dec. 1646), fo. 341.

<sup>34</sup> VOC 1163, Ordre van Antonissen Overtwater voor den corporael van de adalborsten Hendrick Stalman, leggende met elf soldaten aen Lacquemuij omme des Compagnies visthienden gedurijrdende de maenden December en Januarij te ontfangen als wel meer omme de Chinesen bedriegerijen soo veel doenelijck voor te comen, Taiwan (17 Dec. 1646), fo. 341.

夠側面證實，此處有陸路可通安平與赤嵌地區。例如 1639 年時，搭載督察官庫克巴卡前去視察打狗與堯港的舵手德佛里斯 (Maarten Gerrit de Vries)，曾一度想由堯港上岸，取道陸路前往安平，但因海況不佳、登陸困難而退卻。<sup>35</sup>

1646-1647 年間大體因明清交替戰火的影響，許多唐人難民湧入安平、赤嵌，想必他們對於海產，也需求甚殷。韓家寶指出，除了赤嵌一帶的耕地之外，堯港附近的耕地，在 1647 年 10 月時，也列入稻米什一稅的發贖範圍內，且耕地數量不明。<sup>36</sup> 這些零星開墾的土地，似乎不是荷蘭當局計畫下的產物，而可能是追認既有的私墾耕地而來。如果確實如此，這批耕地的出現，應該與前述脫離赤嵌耕地前來捕鳥的農工有關。因為他們本來已經具備農耕的技能，也有管道取得農具與種子。若臺灣當局讓堯港附近這批田地就地合法，應該是違背了巴達維亞當局過去設計「淨空臺灣海岸」政策的用意。

這一地區的農墾地，在鄭成功攻臺前數年，開始出現飛躍性的擴張。韓家寶注意到，二層行溪 (今二仁溪) 以南的耕地面積從 1656 年的 724.8 摩亨，在 1657 年迅速增加到 1,255.4 摩亨。<sup>37</sup> 冉福立 (Kees Zandvliet) 則注意到，1657 年堯港附近成立一新農墾區，稱 Poespas (礁吧思)，或 Quanimswa (觀音山) 農墾區。<sup>38</sup> 1660 年初，臺灣長官佛列德理克·揆一 (Frederik Coyett, 1656-1662 年間任職臺灣) 也承認：

有數千個唐人居住在那裡，從事農耕。這一帶的漁場，也有大量外國漁船在沙灘附近捕魚。……大員的評議會想要在那裡建造一個小的要塞。<sup>39</sup>

<sup>35</sup> VOC 1131, Dachregister gehouden op de vojagie van de E. Nicolaes Couckebacker, gewesene president ende opperhoofd van 's Compagnies negotie in het rijk van japan, gaende per de jachten Lis ene Waterloose Werff in qualite van commissaris aen de coninck van Toncquijn, mitsgaders van daer in deselve qualite tot de visite des Comptoirs ende vordere Compagnies ommeslach tot Tayouan, gelegen op het eijlant Formosa, seijlende van Batavia naer Tayouan, Batavia enz. (27 Sept. 1639), fo. 389.

<sup>36</sup> 韓家寶 (Pol Heyns) 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 105；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2 冊：1641-1648》(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3)，頁 680，1647 年 10 月 10 日條。

<sup>37</sup> 韓家寶 (Pol Heyns) 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 103。(Morgen) 摩亨為地積單位，韓家寶與中村孝志皆認為其大小與萊茵摩亨 (Rijnlandse morgen, 萊茵為今南荷蘭省古名) 相近，即 8,516 平方公尺。參見韓家寶 (Pol Heyns) 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 86，註釋 36。

<sup>38</sup> 格斯·冉福立 (Kees Zandvliet) 著，江樹生譯、解說，《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冊，頁 76。文中另指出此地有 Tikarang 耕地為「竹仔港」。經康培德教授指正，似有誤解。既然已有疑問，在此亦不列出。

<sup>39</sup>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 4 冊：1655-1662》，頁 378。補充自〈長官 F. Coyett 與議會寫給總

其中演變的情況，現存荷蘭檔案史料很少觸及。但韓家寶認為，此處的首次擴張，似與鄭成功於 1656 年實施對臺禁運有關。<sup>40</sup> 曹永和則指出，由於此處當時可由鄰近打狗山區（壽山），獲得充分的薪柴燃料供應，用以煎鹽。居住此處的農民，也可供應糧食加工、物產作坊之人力。在鄭成功攻取臺灣之後，鳳山、觀音山成為重要的屯墾地點，可能是延續了當地由漁民落地墾殖的發展軌跡。<sup>41</sup>

前述有關北大西洋歷史上「異地漁業」活動的研究，可在此做一參證。雖然冰島與愛爾蘭漁民可能早就獲知紐芬蘭漁場的存在，一般咸認，在 1498 年義大利探險家卡博特（John Cabot）受英國委託出海測繪後，此地才正式為歐洲人所知。此後，英、法、西、葡等國船隻都前去撈捕鱈魚，以供應歐洲市場的需要。<sup>42</sup> 經歷約三個世紀的漁業撈捕活動，直到十九世紀後，紐芬蘭才逐漸變為歐洲殖民地，並於 1824 年正式成立政府。遠航從事異地漁業的漁民，多專心致志於供應歐洲市場，紐芬蘭島內既無市場，也非良好耕地，無法吸引漁民遷徙定住。但其南方的新英格蘭殖民地與維吉尼亞殖民地，卻因為各自擁有皮毛與菸草出口產業，成為殖民開發的誘因，受到各國王室與商人的矚目；逐漸以農業墾殖為基礎，緩慢地開始發展本地漁業。<sup>43</sup> 綜言之，從事異地漁業的漁民，本身並不具備充分的商業資本，無法主動形成殖民事業。紐芬蘭「異地漁業」本地化的過程，其實來自於（1）引進馬鈴薯，得以支持人口成長；（2）十八世紀晚期英國與歐洲國家間的戰爭，使得「異地漁業」不如「本地漁業」安全。<sup>44</sup>

紐芬蘭的案例提醒我們，「異地漁業」以商業利益為依歸，不一定會導致殖民，要達成穩定的殖民擴張，往往需要由國家支持、投入資本，維持地方安全並

督 J. Maetsuycker 的信，大員，1660 年 1 月 29 日。此處譯文按原文稍做修改；VOC 1233, Missive van den gouverneur Frederick Coyett naer Batavia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el Joan Maetsuijcker, Taiwan (29 Jan. 1660), fos. 697-698. 這裡所說的「外國漁船」諒指廈門等地前來的中國漁船。

<sup>40</sup> 韓家寶（Pol Heyns）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 105。

<sup>41</sup> 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補說〉，頁 247-249。

<sup>42</sup> Brian Fagan, *Fish on Friday: Feasting, Fasting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pp. 193-271.

<sup>43</sup> Brian Fagan, *Fishing: How the Sea Fed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77-283. 本書指出新英格蘭地區農業墾殖者缺乏肉食，而轉為近海撈捕者的現象，筆者以為與前述臺灣的例子頗為類似。

<sup>44</sup> Shannon Ryan, "Fishery to Colony: A Newfoundland Watershed, 1793-1815," *Acadiensis* (Fredericton) 12: 2 (Spring 1983), pp. 31-52; Peter Edward Pope, *Fish into Wine: The Newfoundland Plant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apel Hill;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推動墾殖，造就出充分的糧食供給。過去荷蘭人統治臺灣，對於捕烏漁業的管理，採取的正是此種「異地漁業」的方針，僅考量其商業利益，反對造成移民，以海岸淨空並透過發給執照的方式控制。在漁產出口前，則採取集中回港抽稅的辦法管理。僅在荷蘭統治後期，才放寬漁民加入土地開墾的措施。雖然 1645 年以後也開放贖港，使居住於熱蘭遮市鎮的贖商可經營臺灣近海漁業撈捕活動，甚至投資捕烏漁業。此舉雖可能吸引漁民移民至臺灣，但由於當時海產主要仍向中國市場出口，其從業人員可能也多來自中國。<sup>45</sup> 贖商所負責的，僅是抽取稅款並監視其行動而已。出售漁獲的主要利益，應該仍在中國市場銷售端。

然而，到了荷治末期，中國戰亂的情況，應已相當程度削減了對岸市場對漁獲的胃納量，戰亂的變數，更造成漁民落地屯墾的誘因。而到了東寧政權治理臺灣時，由於其與大陸市場隔離，又投入軍事屯墾以增加糧食供應，才使得「異地漁業」在漁民移居之後，產生了轉化為本地漁業的可能性。<sup>46</sup>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檔案亦記載了荷治時期日人、荷人與唐人食用烏魚的方式。這方面的記載，有助於我們從「異文化接觸」的角度，探討清領之前，歐洲人與唐人等，對於烏魚的需求狀況。過去，中村孝志已就事實層面，對於華南人群消費烏魚、烏魚子的情況，進行詳細的描述。在此，藉荷蘭東印度公司於 1691-1692 年間派駐日本的德國醫生兼博物學家肯佛（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的記載，增補一些烏魚消費方式的記述：

烏魚（Bora）與鮭魚一樣，有白色非常細嫩的肉，外國人稱為正月魚（Songaats），因為這是在日本人的第一個月所抓獲的。牠的肉如同布列門的鮭魚一樣被燻製過。其子（krit）被稱為唐墨（karassummi），會如同小提琴一樣，十個一串，吊在兩根繩索上。然後從長崎（因為魚是從野母岬送來的）出口到江戶等地，也有外國人輸入的。其他魚子製成的唐墨，則不受重視。<sup>47</sup>

<sup>45</sup> 楊博任，〈荷治時期臺灣的漁業〉，頁 67-101，第四章「漁業生產」。

<sup>46</sup> 季麒光於〈臺灣志書前序：代周又文憲副〉有言，東寧鄭氏「算丁極于老幼，取利盡于魚蝦。」由此可對於荷蘭時代「異地漁業」如何轉化為臺灣「本地漁業」的情況窺知一二。參見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蒼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頁 82。

<sup>47</sup> Engelbert Kaempfer, *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von Japan: Aus den Originalhandschriften des Ver-*

由此可知，日本市場確實消費外國產的烏魚子，當然也包括臺灣所產在內。根據美國歷史學者拉斯（Eric Rath）的研究，十七世紀日本人在正式的婚宴飲酒形式「式三獻」結束後，也會奉上包括烏魚子在內的下酒菜。<sup>48</sup> 由此可知，烏魚子雖非宴席主菜，卻是不可欠缺的點綴。荷蘭人本身並不甚嗜食烏魚，十七世紀前期於巴達維亞執業的醫務員龐蒂優斯（Jacobus Bontius, 1592-1631 年間任職）有此評論：

烏魚常被大量捕獲並於市場出售，在某些固定的季節非常美味。不過有時牠們染上疾病，肉中生蟲，就像我們胡瓜魚的案例一樣。而且牠們的刺很多（如同我們同伴所說的，刺多如毛[harihgh wesen]），吃起來味道也不太好。<sup>49</sup>

對留駐臺灣的荷蘭人來說，在設立商館初期，肉類供給不足，烏魚應是重要的蛋白質來源。<sup>50</sup> 但是只要力所能及，公司則偏好供應獸肉。1639 年 3 月，臺灣當局裝備一艘中式帆船「密德堡」號，由舵手德佛利斯駛往巴達維亞。船上有 16 名荷蘭人與 24 名唐人水手，攜帶足供六個月消耗的肉類、米糧與飲料。公司官員強調，其中肉類是分配給荷蘭人的給養，而魚類則是留供唐人水手使用。<sup>51</sup> 而 1646 年，同一位舵手率領另一艘荷蘭船，前往馬尼拉展開封鎖任務。此船之中，對於糧食飲料的配給如下：

每日 1 荷蘭壺 水  
 1 荷蘭磅 米  
 1 小杯 西班牙酒或亞刺酒  
 每週 2 天吃 牛肉，星期日跟星期四  
 1 天吃豬肉，星期二

---

*fassers herausgegeben, Vol. I* (Lemgo: Meyer, 1777), p. 155. 筆者認為這裡“krit”應與荷蘭語“kuit”同一字源，意指魚卵。

<sup>48</sup> Eric C. Rath, *Food and Fantasy in Early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 125. 此處根據 1672 年出版之《料理献立集》之記載。

<sup>49</sup> Jacobus Bontius, *Bontius Tropische Geneeskunde (Bontius on Tropical Medicine)*, A. Querido, trans. (Amstelodami: Sumptibus Societatis, 1931), p. 277.

<sup>50</sup> 韓家寶 (Pol Heyns) 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 134-135。在漁稅方面，荷蘭人一直到 1648 年都是抽取實物稅而非貨幣稅款，故筆者有此推想。

<sup>51</sup> VOC 1130, Originele missive van gouverneur Jan van der Burch naer Batavia aen gouverneur generael Anthonio van Diemen, Taiwan (12 Mar. 1639), fo. 1411.

半杯 油

半杯 醋

鹹魚跟其他菜色會視情況加入<sup>52</sup>

由以上兩處零碎史料，大抵能窺知，在消費口味上，荷蘭人並不特別偏好魚肉，可能也不嗜食烏魚。韓家寶指出，荷蘭當局偏好以貨幣徵收烏魚出口稅，只是為了減少唐人漁民的損失，才勉予接受實物納稅。這也能側面證實，徵收烏魚作為糧食供應，並非公司關懷所在。<sup>53</sup> 反而是前述唐人墾殖農民有私自捕魚的現象，說明了隨著農墾的發展，安平、赤崁一帶的定居移民，也開始擴大消費烏魚的需求。這一點正說明了本地市場的擴大與烏魚漁業的本地化，兩者處於並行的過程。到了清領初期，烏魚的漁獲自然逐漸被視為安平、赤崁墾殖者的重要食物來源，進而被認可為一種臺灣本地的特色漁獲。

### 三、殖民交會下誕生的土魷俗名

#### (一) 國王魚即馬鮫鱈

有關「土魷」這個名稱，在中國東南沿海各省的漢文歷史資料中，鮮有痕跡，卻在清領初期，被認定為臺灣俗語。令人好奇的是，在荷治時期，是否亦有關於撈捕土魷之漁業記載？

在荷蘭人的記載中，特別抽取漁稅的，有兩種漁產，除了前述的烏魚外，則為所謂的「國王魚」(Konigvis，又譯「帝王魚」)。對此，生物學家于景讓曾經提出，可能是臺灣海域常見的鱈科魚類；而中村孝志則主張，此魚既然是大西洋亦存在的大型魚類，有可能是指鯖科魚類。由於此一問題並非中村教授過去研究的重點，故其未深究，僅保留直譯的名稱，以待後人。<sup>54</sup> 其後，翁佳音曾為文肯

<sup>52</sup> VOC 1160, Resolutiën getrocken bij den commandeur Marten Gerritsz de Fries en deselfs raede der vloote, van 17 Maert 1646 tot 2 Augustus 1646, on the Ship Wesel (17 Mar. 1646-2 Aug. 1646), fo. 503<sup>v</sup>. 21 Mar. 1646.

<sup>53</sup> 韓家寶 (Pol Heyns) 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 135-136。

<sup>54</sup> 中村孝志，〈臺灣南部鰹漁業再論〉，頁 150，註釋 8；于景讓，〈臺灣的帝王魚〉，《大陸雜誌》(臺北) 12: 8 (1956 年 4 月)，頁 235-238。

定中村孝志的見解，但除了以「歷史連續性」之直觀、英語「國王魚 (Kingfish)」與荷蘭語「國王魚 (Konigvis)」語言上之對應外，並未明確提出其他證據。<sup>55</sup>

此一問題的癥結，在於荷蘭人的記載，遠早於近代魚類學發端的年代。本文在導論中已經提到，希望能另闢蹊徑，擷取近年科學史中對於殖民交會下人與動物關係研究之經驗，來釐清「國王魚」與「土魷」兩種魚名，曾指涉哪些對象？並進一步探討這些指涉間是否有所重合，抑或完全無關？如此，方能評價近代生物學調查的結果與早期歷史文獻資料，兩種性質迥異的紀錄之間，有何對應關係。

要研究這樣的指涉變化，首先，必須對生物學史上，林奈 (Carl Linnaeus, 1707-1778) 提出的生物分類法之確立過程有所認識。瑞典學者林奈是一位植物學家，在從事植物收集分類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一套生物分類法則，並於 1758 年出版的《自然系統》( *Systema Naturae* ) 一書中正式提出。此一法則廣受肯定，被各國博物學者普遍跟從與運用。當其時，正值歐洲的啟蒙時代，學者熱衷於取得普世不變的知識，也信仰自然界反映了上帝所制理性規則的觀念。當時歐洲各國成立的科學研究機構，也共同採行並推動此種生物分類法及以拉丁文標示的學名命名法，將其普世化。如此，經過兩個世紀的發展後，才有今日生物學的規模。以下，本文將追索土魷魚被納入此一分類中的過程，確立所欲調查的對象。

依現今生物學的分類與命名規則，土魷魚的正式學名為「康氏馬鮫鱈」( *Scomberomorus Commersoni* )。魚類學名之登錄，須經過生物學社群的認可，在臺灣本地出現近代生物學者之前，當然不存在「土魷」的學名登錄記載。近代生物學的引進與近代知識引入東亞的過程，大致同步。臺灣土魷魚被認定為「康氏馬鮫鱈」，首見於加州大學校長、美國魚類學之父喬丹 (David Starr Jordan, 1851-1931) 與魚類學者理查森 (Robert Earl Richardson, 1877-1935) 於 1906 年共同出版的〈臺灣魚類目錄〉“A Catalog of the Fishe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or Taiwan, Based on the Collections of Dr. Hans Sauter”一文中。當年，美國加州大學卡內基博物館輾轉收購了一批由昆蟲學者梭德 (Hans Sauter, 1871-1944) 於前一年 (1905) 從打狗漁市場取得的魚類標本，這批標本被送交前述兩位作者鑑定分

---

<sup>55</sup> 翁佳音，〈國王魚 (Kingfish) 的故事〉，頁 23-24。

類。於此，確立了包含本文所述「土魷魚」在內魚種的生物學歸類。<sup>56</sup> 此一目錄第 97 件記載俗名 To to 的魚類，長約 21 英吋（53.3 公分），取自於打狗，被鑑定記錄為「康氏馬鮫鱈」。To to 應即為「土魷」，<sup>57</sup> 但所謂的「康氏馬鮫鱈」，最早在十九世紀，就已被登錄於魚類分類中。

「康氏馬鮫鱈」中的「康氏」，來自於法國博物學家康默森（Philibert Com-merson, 1727-1773）之名。此人為 1766 年由法國探險家布干維爾（Louis de Bougainville）所率領的環球科學調查航行隨行學者之一，曾經探訪南美洲東岸、火地島、大溪地，以及美拉尼西亞諸島、爪哇等地。該艦隊最後安全回返法國，但康氏選擇中途停留在模里西斯島從事自然學研究，最終埋骨於此。康氏遺留大量的動植物觀察圖繪手稿，在當時，尚未能依照林奈分類法來綜理歸屬。這些圖繪資料，後來被法國魚類學者拉西佩德（Bernard Germain de Lacépède, 1756-1825）採用，其將康氏手稿中採錄圖繪的一種新種鯖科魚類命名為「康氏馬鮫鱈」，於 1800 年納入其《魚類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des poissons*）第 2 冊中出版（參見圖一）。<sup>58</sup>

筆者雖未能取得康氏最初繪製的手稿圖片與說明，卻在動物學者居維葉（Georges Cuvier, 1769-1832）的轉述中窺知，康氏是在 1769 年於模里西斯島採錄了這一則魚類資料。當時「康氏馬鮫鱈」的俗名被記載為 Tassard 或 Bécune。居維葉並解說，前者借自加勒比海法屬馬提尼克島某種鮪魚的俗名，後者則是借自同地一種金梭魚（*Sphyaena*）的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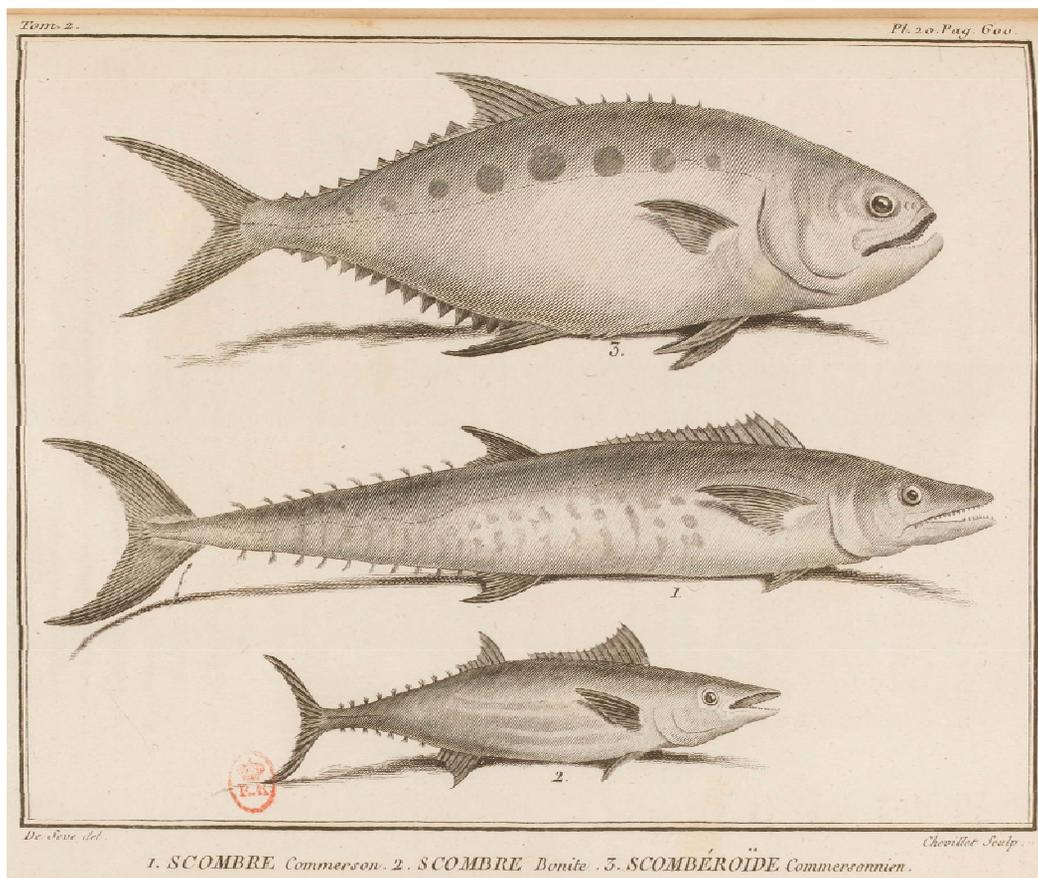
由此可知，「康氏馬鮫鱈」最早被採錄之時，其俗名是從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海域其他同種、但稍有區別的魚類借來的。按照魚類學者桑內福（Jacques S. Zaneveld, 1909-2001）於加勒比海的調查，在當地被稱為 Tassard 的魚類，都是在外觀上稍有差異，但其實同為馬鮫屬的鱈魚。<sup>59</sup> 此外，金梭魚雖然與馬鮫鱈分

<sup>56</sup> D. S. Jordan and R. E. Richardson, "A Catalog of the Fishe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or Taiwan, Based on the Collections of Dr. Hans Sauter," *Memoirs of the Carnegie Museum* (Pittsburgh) 4: 4 (1909), p. 159.

<sup>57</sup> D. S. Jordan and R. E. Richardson, "A Catalog of the Fishe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or Taiwan, Based on the Collections of Dr. Hans Sauter," p. 177.

<sup>58</sup> Brian Greig Saunders, *Discovery of Australia's Fishes: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Ichthyology to 1930* (Collingwood, Vic.: CSIRO Pub., 2012), pp. 6-7.

<sup>59</sup> Jacques S. Zaneveld, *Caribbean Fish Life* (Leiden: E. J. Brill, 1983), pp. 38-39, 94-95. 有現在學名為「大耳馬鮫鱈（*Scomberomus cavalla*，在海地、多巴哥、千里達、聖巴泰勒米、法屬西印度群島、波多黎各如此稱）」；「精斑馬鮫鱈（*Scomberomorus maculatus*，於法屬西印度群島如此稱）」；「條斑馬鮫



圖一 拉西佩德《魚類自然史》當中的「康氏馬鮫鱈」附圖

圖片來源: Gallica.bnf.fr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授權。Bernard Germain de Lacépède and Georges-Louis Leclerc Buffon, *Histoire Naturelle des Poissons*, Vol. 2 (Paris: Chez Saugrain, 1800), p. 600, plate 20.

屬不同科，但由於其成魚亦可長至兩公尺長，而其身上亦有鮮明的深色直條紋，故漁民或水手借其名稱 *Bécune* 來指稱「康氏馬鮫鱈」，亦不無道理。既然所謂 Tassard，在加勒比海地區多半指稱鯖科的鱈屬魚類。同理，亦不難推想，在模里西斯島法國水手會採用 Tassard 來代稱「康氏馬鮫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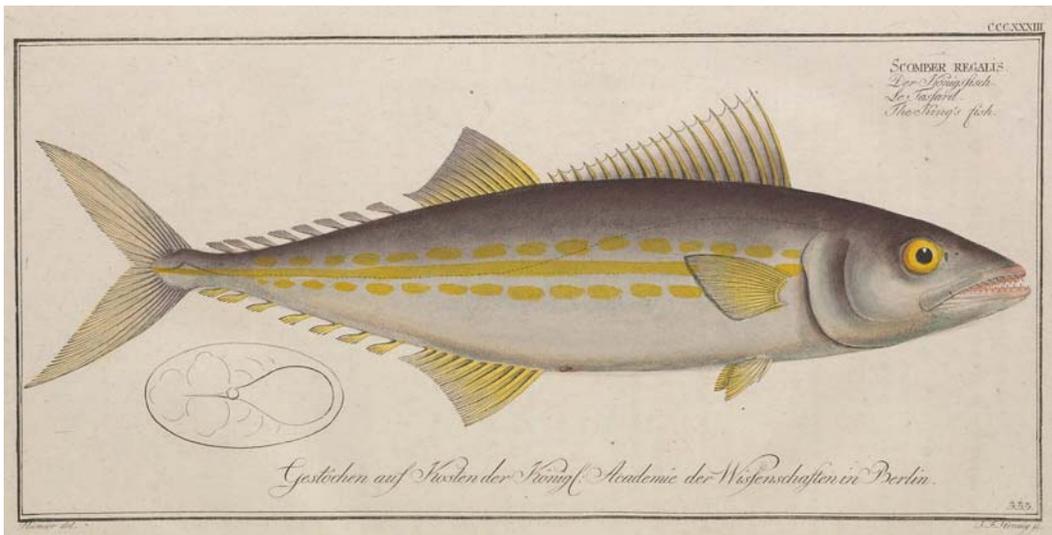
再者，如按照前述桑內福的研究，在過去由荷蘭統治的部分加勒比海地區所謂 Tassard，也被稱為 *Koningsvis*，即前述「國王／帝王魚」，在荷屬安地列斯島

---

鱈 (*Scomberomorus regalis*，於英屬西印度群島、法屬西印度群島、瓜德羅普群島、波多黎各如此稱) 數種。而加勒比海海域也使用 *Bécune* 來泛指金梭魚，特別是在海地和法屬西印度群島。如大鱈魷 (*Sphyræna barracuda*) 在庫拉索島原住民的語言當中，被稱為 *Bécuna*。

則被記載為所謂「大耳馬鮫鱈」。同樣地，若在當地使用原住民的帕皮阿門託語（Papiamentu）發音，該魚類則被稱為 Konevéés，兩者的發音非常近似，這顯然是原住民借自荷蘭語的外來語稱法。<sup>60</sup>

「康氏馬鮫鱈」被稱為 Tassard，而「馬鮫鱈」在當時確實常被稱為「國王魚」。例如日耳曼博物學者布洛赫（Marcus Elieser Bloch, 1723-1799）曾出版 12 卷的《一般魚類自然史》（*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der Fische*），為近代魚類學奠下基礎。他在 1793 年刊行的第 7 卷中，探討了德語俗名稱為「國王魚」（Königsfisch）的魚類，認定其即為「條班馬鮫鱈」（*Scomber Regalis*）。<sup>61</sup> 雖然當時德文版並未附圖，但在 4 年後出版的法文版中，不但將「條班馬鮫鱈」之俗名列為 Tassard，也附了如下的圖版：



圖二 布洛赫《一般魚類自然史》的「條班馬鮫鱈」／「國王魚」附圖

圖片來源：Gallica.bnf.fr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授權。Marcus Elieser Bloch, *Ichthyologie, ou, Histoire naturell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 des poissons: avec des figures enluminées, dessinées d'après nature*, Vol. 10 (Berlin: Chez l'auteur & chez François de la Garde libraire, 1797), plate CCCXXXIII.

<sup>60</sup> Jacques S. Zaneveld, *Caribbean Fish Life*, pp. 94-95. 其他上述非屬荷蘭統治，在加勒比海各地仍被稱為 Tassard 的種種鱈魚，則多不再被稱為國王魚（Koningsvis）了。只有條班馬鮫鱈，仍被原住民稱為“Konevéés”。

<sup>61</sup> Marcus Elieser Bloch, *Naturgeschichte: Der Ausländischen Fische*, Vol. 7 (Berlin: Königlische Akademischen Kunsthandlern J. Morino & Comp., 1793), pp. 38-43.

如同拉西佩德一樣，布洛赫當時也是依據普魯士從各地收集到的樣本。因此，他尚不知道世界各地仍有許多不同種類馬鮫屬的鰹魚，更不知道「康氏馬鮫鰹」的存在。但布洛赫踏實地蒐羅了當時歐洲歷史上透過海外探險遺留下來的魚類敘述，並加以歸納整理。他因此發現，十七世紀在東印度地區被荷蘭人稱為「國王魚」(Könings-visch, Conings-visch) 的魚種，在西印度地區，包括安地列斯群島也有相關的報導，被稱為 Tassart、Tazard 或 Tassard 魚，其實是同種魚類。他以最早繪製此魚圖形的荷蘭人尼霍夫 (Johan Nieuhof, 1618-1672) 的繪圖為證，認為是同種魚類，只是當時繪製的圖形不夠精確，少繪了第一個背鰭。<sup>62</sup>

本節的目的，並非探討馬鮫屬鰹魚在魚類學的分類中，何時臻至完美，而是意圖解明，荷治時期俗名為「國王魚」者，究竟為何種魚類？上述尼霍夫對於此種魚類的繪圖記載，雖非完全符合科學的要求，對釐清前述問題，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布洛赫所指的圖形，刊載於尼霍夫著作《經歷巴西與東印度各地的卓越水陸旅程》(Johan Nieuhofs Gedenkwaardige Brasiliaense zee-en lant-reize) 一書中 (參見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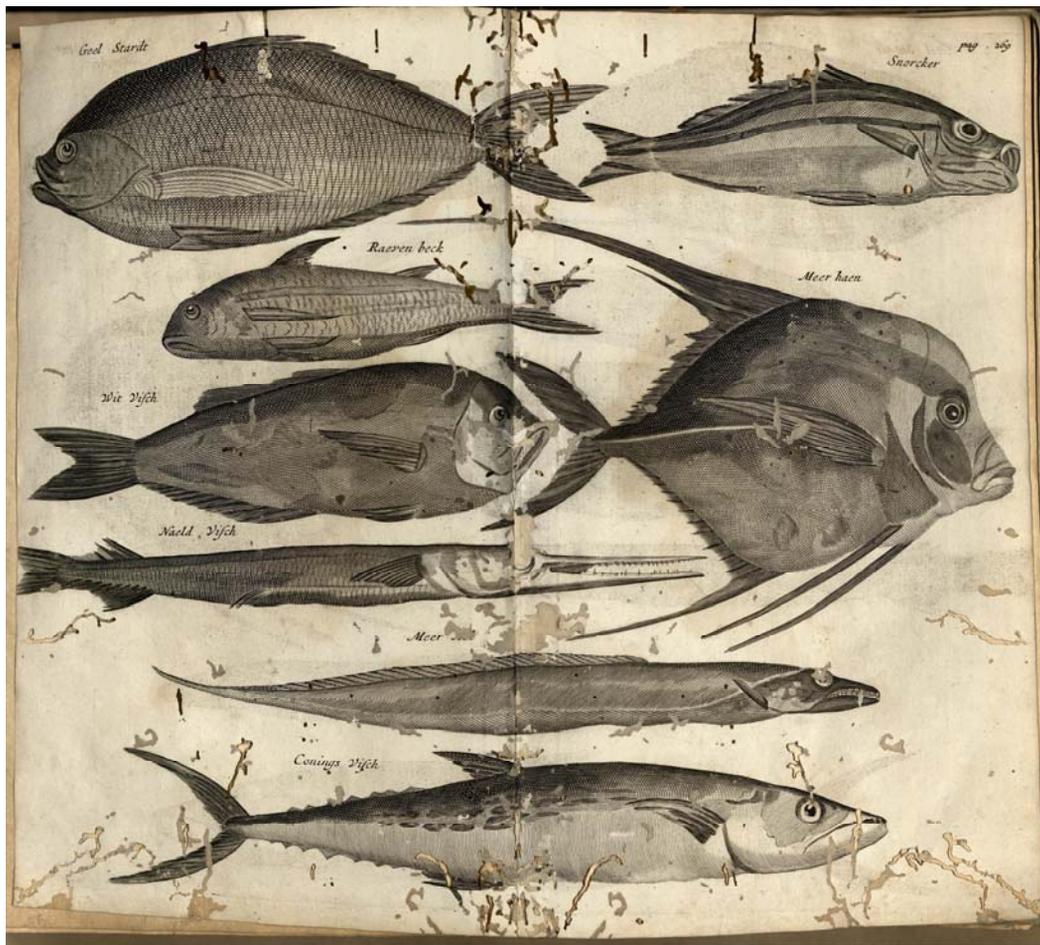
此圖最下方者，即為「國王魚」(Conings-visch)，在圖說中，尼霍夫這樣描述：

「國王魚」是由於其味道極好，才獲此稱號。[此種魚]無論是口味或對於健康都很好，是我們在印度地區能看到最佳的魚類之一。有些能長到 5 荷蘭呎長。尾鰭很長，而且分開。背上和側面有分離的棕色塊斑，下面到腹部則是白色。牠們的嘴能張的很開，貪心的吞咬一切東西。<sup>63</sup>

這一段話列在尼霍夫對「東印度」動物的介紹中。值得一提的是，尼霍夫本人為《荷使初訪中國記》的作者，曾於 1649-1662 年間在中國與巴達維亞間的海域活

<sup>62</sup> Marcus Elieser Bloch, *Naturgeschichte: Der Ausländischen Fische*, Vol. 7, pp. 38-43.

<sup>63</sup> Johan Nieuhof, *Johan Nieuhofs Gedenkwaardige Brasiliaense zee-en lant-reize: Behelzende al het geen op dezelve is voorgevallen. Beneffens een bondige beschrijving van gantsche Neerlants Brasil, zoo van lantschappen, steden, dieren, gewassen, als draghten, zeden en godsdienst der inwoonders: en inzonderheit ein wijtloopig verhael der merkwaardigste voorvallen en geschiedenissen, die zich, gedurende zijn negenjarigh verblijf in Brasil, in d'oorlogen en opstant der Portugesen tegen d'onzen, zich sedert het jaer 1640. tot 1649. hebben toegedragen. Door gaens verciert met verscheide afbeeldingen, na't leven aldaer getekent* (Amsterdam: Voor de Weduwe van Jacob van Meurs, 1682), p. 270. Hereafter "Johan Nieuhofs Gedenkwaardige Brasiliaense zee-en lant-reiz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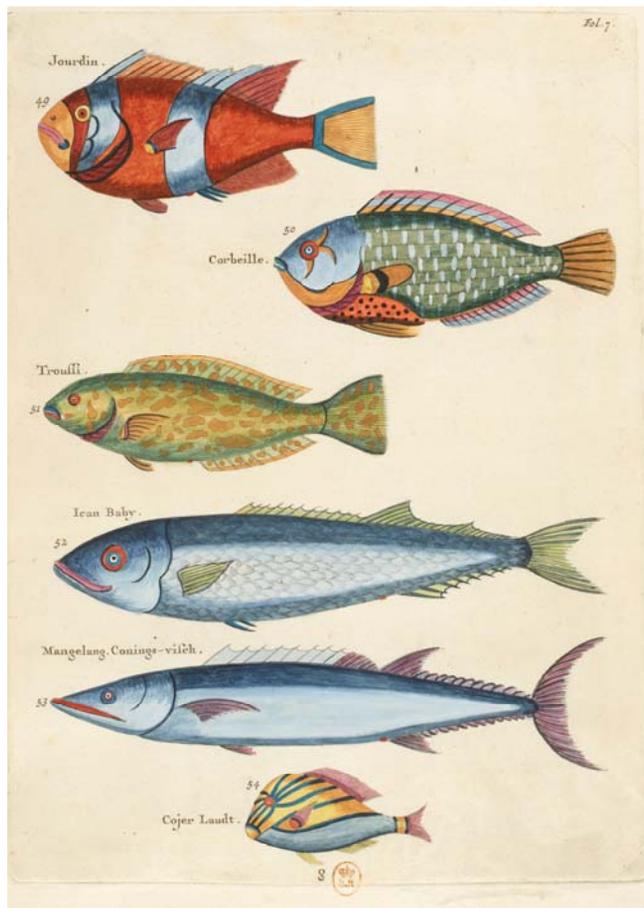
圖三 尼霍夫《經歷巴西與東印度各地的卓越水陸旅程》一書  
附載「國王魚」圖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授權。Johan Nieuhof, *Johan Nieuhofs Gedenkweerdige Brasiliaense zee-en lant-reize*, p. 269.

動。之後則前往印度，直到 1672 年才返國。<sup>64</sup> 是以，從其活動的時空範圍來看，他所指稱的「東印度地區」，必然涵蓋中國到印尼間的海域，可能也包括印度洋。而在 1624-1662 年間，即使他未曾踏足臺灣，與他同時在這一海域活動的荷蘭人，應該也曾將各種鯆魚稱之為「國王魚」。

<sup>64</sup> 關於《荷使初訪中國記》的詳盡研究，請參見約翰·尼霍夫 (Johan Nieuhof) 原著，包樂史 (Leonard Blussé)、莊國土著，《《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前述布洛赫還引證了雷納德 (Louis Renard) 於 1719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另一份魚類圖鑒《摩鹿加及其南方海岸魚類、小龍蝦與蟹類之彩色圖繪》(*Poissons, écrevisses et crabes de diverses couleurs et figures extraordinaires, que l'on trouve autour des îles Moluques et sur les côtes des terres australes*)。該書於第 1 冊第 7 圖頁刊載了「國王魚」的圖形 (53 號, 標示為「國王魚」或 Mangelung; 參見圖四)。



圖四 雷納德《摩鹿加及其南方海岸魚類、小龍蝦與蟹類之彩色圖繪》  
當中的「國王魚」附圖

圖片來源: Gallica.bnf.fr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授權。Louis Renard, *Poissons, écrevisses et crabes, de diverses couleurs et figures extraordinaires, que l'on trouve autour des îles Moluques et sur les côtes des terres australes: peints d'après nature Durant la régence de messieurs van Oudshoorn, van hoorn, van Ribeeck & van Zwoll, successivement gouverneurs-généraux des indes orientales pour la Compagnie de Hollande* (Amsterdam: Reiner & Josue Ottens, 1754), p. 7.

此圖雖較前幅更為粗略，但根據魚體尾鰭特徵、各處的鰭形與位置，都能判定其所繪製的是一種鱈魚。圖中，其軀體上沒有特別的斑點或紋路，所以不能逕自斷定其為何種馬鮫鱈。雷納德於該書導論中提到，本圖鑒第1卷（亦即前引出處），其圖樣摹自安汶與班達長官巴爾塔札·揆一（Baltazar Coyett, 1650-1725，以下稱為「小揆一」）收藏之手稿。亦即，小揆一蒐集了這些魚類標本，並命人描繪成圖。這位小揆一，即最後一位臺灣長官佛列德理克·揆一（Frederick Coyett, 1615-1687）之子，出生於熱蘭遮城。<sup>65</sup> 小揆一於臺灣長大，是以，他在安汶認定為「國王魚」的魚類，與當時在臺灣的認定，應無不同。

此外，著名的東印度公司歷史學者華倫坦（François Valentijn, 1666-1727，有譯為「法連太因」者）在《新舊東印度公司誌》中，也曾介紹「國王魚」，他說：

我們在安汶還有東印度許多地方，能取得的最好的一種魚為 Ikan Radja，即是「國王魚」。除了鮭魚之外，沒有任何荷蘭的魚能比得上牠。除此之外，牠被煮了以後，肉仍保持白色。肉質富含油脂，好吃又健康。多拿來醃漬，送到海上當成補給品。牠大約是2荷呎半或3荷呎長，圓頭，眼睛頗大，背是深棕色，上面有鰭，後面接著在尾上有銳利的刺。腹部是白色，很長，鰭卻很窄。順著魚體曲線很好切塊，就如同要切鮭魚配酒一樣。<sup>6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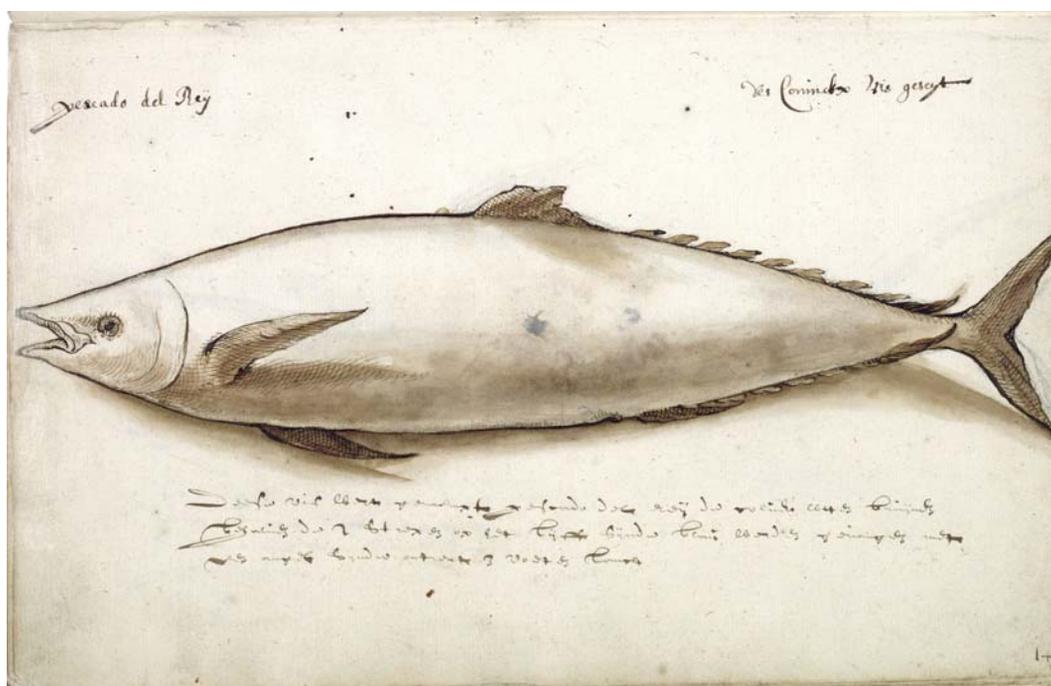
作者華倫坦雖未曾親身訪臺，卻曾與臺灣歸返巴達維亞的荷蘭俘虜相識。他利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文獻撰寫與臺灣相關之概述時，提及「國王魚」，與本文所述者，亦應無不同。<sup>67</sup>

<sup>65</sup> P. C. Molhuysen and P. J. Blok, *Nieuw Nederlandsche Biografisch Woordenboek, Vol. 8* (Leiden: A. W. Sijthoff's Uitgevers-Maatschappij, 1930), pp. 328-329.

<sup>66</sup> François Valentijn,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Omstandig Verhaal van de Geschiedenissen en Zaaken Kerkelyke ofte den Godsdienst betreffende, zoo in Amboina, als in alle de Eylanden, daar onder behoorende, van de oudste tyden af tot nu toe, benevens een Fraaye Verhandeling der Boomen, Planten, Heesters, enz. als ook der Land-dieren, Vogelen, Visschen, Horfnkens, en Zeegewasschen, in en by dezelve Eylanden vallende; Mitsgaders een Naaukeurige Beschryving van Banda, ende Eylanden, onder die Landvoogdy begrepen, als ook der Fylanden Timor, en Solor, Celebes, ofte Macassar, Borneo en Bali, mitsgaders van de Koningryken Tonkin, Cambodia en Siam, benevens een Verhaal der Zaaken, in de voor-noemde Eylanden, en Koningryken, tot nu toe voorgevallen, Vol. 3* (Dordrecht: Joannes van Braam, 1726), p. 338. 以下書名將略縮為“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Ikan 即馬來語的「魚」，Radja 為「國王」。

<sup>67</sup> 關於華倫坦與臺灣歸返的俘虜遭遇的情況，參見鄭維中，〈明清鼎革之際投鄭荷兵兩果·羅珊事略〉，

有關十七世紀荷蘭人早已將亞洲海域的鱈魚稱為「國王魚」，最具關鍵性的證據，來自 1917 年重新自荷蘭海牙檔案館出土的一份文獻《大船吉德蘭號航海兩冊本日誌，1601-1603》(*Het tweedelige journaal van het schip Gelderland, 1601-1603*)。此份手稿作成於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之前，荷蘭各城市分頭集資、派遣船隻航向東亞的「先驅公司」時代。<sup>68</sup> 手稿中記載了吉德蘭號由荷蘭經巴西沿岸、好望角、模里西斯島、摩鹿加群島、萬丹，乃至最後返國的航程。日誌佚名之作者，對旅途中遭遇的生物，留下生動的素描，其中一幅「國王魚」繪圖如下：



圖五 《大船吉德蘭號航海日誌》當中「國王魚」之素描

圖片來源：Nationaal Archief, Den Haag, Compagnieën op Oost-Indië, nummer toegang 1.04.01, inventarisnummer 135, fo. 7.

《海洋史研究》(北京) 9 (2016 年 7 月), 頁 235-238、244；關於華倫坦著作中提及臺灣的部分，參見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308。

<sup>68</sup> Nationaal Archief, Den Haag, Compagnieën op Oost-Indië, nummer toegang 1.04.01, inventarisnummer 135. 本手稿經學者抄錄完成並註釋後，出版成 Perry Moree, *Dodo's en galjoenen: De reis van het schip Gelderland naar Oost-Indie, 1601-1603* (Zutphen: Walburg Pers, 2001). 史料發掘的過程，參見此書頁 42-49。此檔案標題為 Moree 所下，迄今檔案館仍未對此指定標題。

這是較尼霍夫更早約 46 年前的記載，素描上文字標示有：

國王魚 (connickx vis)，體色除了兩條藍色線條外，為棕色與白色。是用魚鉤釣起來的，約有 3 荷呎長。<sup>69</sup>

綜上所述，荷治時期所稱的「國王魚」，無疑是馬鮫屬的一種鱈魚，而非于景讓所推測的鱈科魚類。

「國王魚」作為一種馬鮫鱈的泛稱，當然應該包含了俗稱「土魷魚」的「康氏馬鮫鱈」在內。十七世紀，荷蘭人在管理亞洲海域漁業時，還沒有將各種馬鮫鱈詳加區分的必要，在文獻中，自然不會特別將「康氏馬鮫鱈」從「馬鮫鱈」中析出。當「康氏馬鮫鱈」於 1769 年首次在模里西斯島被登錄時，這個島嶼已經由荷蘭轉入法國之手有 59 年之久，所以，彼處也並未留存明確的荷蘭文獻，可用以確認「康氏馬鮫鱈」曾被稱為荷蘭語之「國王魚」。惟前文已經指出，「康氏馬鮫鱈」之俗名被登錄為 Tassard，是由西印度群島根據馬鮫鱈的俗名借來。而在西印度群島被荷蘭統治之地區，仍有將 Tassard 稱為荷蘭語「國王魚」者。再加上《吉蘭德號日誌》中稱鱈魚為「國王魚」，足證在十七世紀法國人統治之前的模里西斯島，荷蘭人也曾稱「康氏馬鮫鱈」為「國王魚」。

以上列舉種種證據，確證荷治時代臺灣所指的「國王魚」，應為當代各種馬鮫鱈，亦包括俗名「土魷」的「康氏馬鮫鱈」在內。其後，本文將進一步討論，為何「康氏馬鮫鱈」之俗名在臺灣被稱為「土魷」的歷史因由。由於此一變化有其歷史脈絡，本文將嘗試還原過去殖民交會的場景，來加以解釋。

## (二) 土魷俗名的由來

在亞洲地區，即使是荷蘭人統治的殖民地，十八世紀之後，也未繼續使用「國王魚」來指稱馬鮫鱈。根據《東印度告令集》的記載，爪哇島於 1754 年 6 月 21 日頒布過關於承贖漁市場稅的告令條文，其中便以「國王魚」或 Tangierie 來指稱馬鮫鱈。<sup>70</sup> 可見，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後，馬鮫鱈在馬來語系統中的印尼語名稱

<sup>69</sup> Perry Moree, *Dodo's en galjoenen: De reis van het schip Gelderland naar Oost-Indie, 1601-1603*, p. 55. 歷史學者 Perry Moree 將之比對為鱈屬魚類。

<sup>70</sup> J. A. van der Chijs, comp.,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Vol. 6* ('s Hage: Martinus Nijhof, 1889), p. 679.

Tangierie，逐漸取得優勢。

英屬馬來亞殖民地官員麥斯威爾（C. N. Maxwell）所發表的《馬來亞魚類》（*Malayan Fishes*）一書中，將馬鮫鱈之俗名登錄為 Tenggiri，而「康氏馬鮫鱈」則被特稱為 Tenggiri batang。<sup>71</sup> 加州大學魚類學者塞爾（Alvin Seale）於 1909 年從事菲律賓漁產評估時，也將「康氏馬鮫鱈」的俗名登載為 Tanguingue、Tangili 或 Tangi。<sup>72</sup> 由此可知，在東南亞大部分受到馬來語影響的地區，荷蘭語「國王魚」的稱號並未普遍被當地語言所接納。反而是本地馬來語的稱法，在由羅馬字母標音、加以文字化之後，廣泛受到認可。無論在爪哇、馬來半島或菲律賓，其主要從事漁業的人口，多屬於使用馬來語系統語言的人群。是以，當地魚類之名稱主要根據馬來語而來，應為理所當然之事。

十八世紀之後，臺灣漁業的從業人口主要為唐人。於臺灣從事漁業者，似與馬來語世界交涉不深。故民間一般使用的魚類名稱，並沒有受到馬來語太多影響。十八世紀後，「康氏馬鮫鱈」在臺灣有「泥鱸」、「土鱸」、「塗魷」、「土魷」等四種稱法（詳見後文）。如前所述，在十九世紀末期，「土魷」的俗名被納入近代魚類學分類之登載。從發音上看，以上一系列名稱，顯與馬來語的稱法無關。故可推知，近三百年來，臺灣民間的稱法，並未受到馬來語的影響。

倘若臺灣漁民未曾受到馬來語之影響，而如前所述，荷治時期均稱馬鮫魚為「國王魚」，則臺灣民間或許應如受到荷蘭人統治，因而通行荷語的荷屬安地列斯島一樣，將荷語發音的「國王魚」名稱借入臺灣當地語言中才是。然而，事實證明臺灣民間並未留存任何與荷語「國王魚」類似的詞彙，來稱呼「康氏馬鮫鱈」。

從另一角度來看，即使學名為「康氏馬鮫鱈」的魚類，在十七世紀的漢語中，未有完全對應的詞彙，「鱈魚類」既然為一種普遍被食用的魚種，在漢語中應該至少會如同其他中大型食肉鯖科魚類，如「鮪魚」、「鰹魚」一樣，存在著對應的詞彙。是以，在漢語中亦應能找到對應於「鱈屬魚類」的詞彙才對。

十九世紀晚期彙編出版的一本荷蘭語-漳州話字典《荷華文語類參》中，將現今俗稱的「黑鮪魚」（*Scomber Thynnus*，又稱「藍鰭金槍魚」），以漳州話條目

<sup>71</sup> C. N. Maxwell, *Malayan Fishes* (Singapore: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21), p. 83.

<sup>72</sup> Alvin Seale, "The Fishery Resources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art I: Commercial Fishes," *Philippine Journal of Science* (Manila) 3: 6 (Dec. 1908), pp. 518-529.

標示為「馬鮫魚、社交魚、擺錫鮫」。雖然其中也標示了「鮪」(Scomber Sibub)與「鰹魚」(Scomber Pelamis)，但兩者顯然這是取自當時日本新造的漢字，並非屬於「馬鮫」這樣的漢語傳統字彙。同樣地，這本字典將荷蘭語「撈捕鮪魚」(Tonijnenvangst)，以漳州話條目標示為「捉馬鮫魚」，也可旁證時人以「馬鮫魚」來涵蓋泛稱大型鯖魚屬魚類的習慣用法。<sup>73</sup> 而根據魚類分類近詳早略的一般情況來推論，「馬鮫魚」正是為華南一帶居民所假借，用以稱呼所有鯖科大型魚的用語。其中，應該也包括各種馬鮫鱈，乃至俗稱「土魷」的「康氏馬鮫鱈」在內。

是以，有關十九世紀之前歷史文獻中所記載之「馬鮫」，便不能被簡單地視為指稱一種單一魚種，而應包括了鮪魚、鰹魚、鱈魚等在內，是一種概括所有中大型鯖科魚類的泛稱。例如，十六世紀嘉靖刻本之《惠安縣志》記載「鮪鮫……皆乘春令而至。」<sup>74</sup> 萬曆刻本之《泉州府志》記載「鮪鮫，色青、有齒、氣腥。」<sup>75</sup> 萬曆刻本之《漳州府志》記載「鮪鮫，色蒼、無鱗，極肥美。」<sup>76</sup> 而崇禎刻本《海澄縣志》則載「馬鮫：身圓而狹長，無鱗與鰓。諺云：山食鷓鴣麝，海食馬鮫鱈，蓋重之也」。<sup>77</sup>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最近由馬尼拉取得的《漳州話詞彙》一書，其中條目記載「Tanguingue pescade：馬交魚」。<sup>78</sup> 而前述 1909 年菲律賓之漁產調查中，已將「康氏馬鮫鱈」(土魷)之俗名標示為 Tanguingue，與《漳州話詞彙》西班牙文的 Tanguingue 一致。由此可知，至少在十七世紀初期，居住於馬尼拉的漳州人，亦曾將「康氏馬鮫鱈」(土魷)稱為「馬交(鮫)魚」(之後才改用馬來語稱法 Tanguingue)。這證明了「馬鮫魚」一詞，確實長期指涉包括了鯖科的各种魚類。

<sup>73</sup> Gustaaf Schlegel,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ct hoofdzakelijk ten behoeve der tolken voor de Chineesche taal in Nederlandsch-Indië*, Vol. 4a (Leiden: E. J. Brill, 1888), p. 154.

<sup>74</sup> 張岳纂修、莫尚簡督修，《惠安縣志》(臺北：臺北市惠安同鄉會，1973)，13卷之5，頁17。

<sup>75</sup> 陽思謙修，徐敏學、吳維新纂，《萬曆重修泉州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卷3，頁52。

<sup>76</sup> 羅青霄修纂、陳叔侗點校、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漳州府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卷13，頁405，〈龍溪縣志·鱈之屬〉。

<sup>77</sup> 梁兆陽修，蔡國禎、張燮等纂，《海澄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卷11，頁33，〈風土志·魚之屬〉。

<sup>78</sup>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Manila, Anonymous,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Ms. 215, fo. 484<sup>v</sup>. 在此感謝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陳宗仁及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李毓中兩位允許參閱此份手稿。

「馬鮫鱈」是迴游於熱帶、亞熱帶海域的魚類，其遊蹤自不限於臺海。在乾隆刻本之《瓊州府志》也能見到其蹤跡，指稱「馬膏即馬鮫」。<sup>79</sup> 而《廣東新語》所稱一種美味海魚「馬膏郎」，即指「馬鮫鱈」。此可能即前引雷納德圖鑒中，「國王魚」的另稱 Mangelung 之對音。<sup>80</sup> 另在同時代之《澳門記略》中，記載了「狗魚」的情狀：

飛魚僅尺許，能貼水而飛。有狗魚，善窺飛魚之影，伺而啖之……舟人以雞羽或白練，繫利鉤，飄揚水面，為飛魚狀，狗魚躍而吞之，亦被獲。<sup>81</sup>

從其描述追逐飛魚的狀況來看，這裡所指稱的應該也是鯖科的食肉魚。而「狗」的粵語與閩音「交、鮫」相同，故這裡所說的「狗魚」，也應同屬於馬鮫鱈。<sup>82</sup> 由此可見，雖然「土魷」之名稀見於華南方志記載，並不表示華南漁民不知道這種魚。<sup>83</sup> 比較可能是因為假借名稱的關係，閩粵漁民將所有鯖科的魚類，都用「馬鮫魚」來指稱。

筆者認為，在臺灣，由於荷蘭人的統治，影響、改變了閩粵漁民對此魚的稱呼。荷蘭人雖然稱「康氏馬鮫鱈」為「國王魚」，卻不表示當時居住在臺灣熱蘭遮城的唐人市民，也一定使用荷蘭語來稱呼此魚。筆者認為，想知道當時唐人如何稱呼此魚，應該追索當時與唐人互動較多的基層荷蘭士兵與水手，如何稱呼此魚。

無獨有偶，上述《澳門記略》之引文，早在義大利航海家皮加費塔（Antonio Pigafetta, 1491-1531）的航海記中，即有若合符節之記載。他在南太平洋有此見聞：

在海洋中能看到非常趣味的獵魚情況：這樣的魚類有 3 種，身長是一肘或更長，稱為 Dorado, Albacore 和 Bonito, 牠們追著稱為 Colondrini 的飛魚……

<sup>79</sup> 蕭應植、陳景墳纂修，《瓊州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之 1（下），頁 102，〈物產·鱈〉。

<sup>80</sup> 屈大均撰，《廣東新語》（臺北：中華書局，1983），卷 22，頁 554，〈鱈語〉。

<sup>81</sup> 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頁 72，〈下卷·澳蕃篇〉。

<sup>82</sup> 1936 年時康氏馬鮫鱈在香港即登錄為 Lam teen keaou（藍點鮫）。參見 Henry W. Fowler, "A Synopsis of the Fishes of China. Part. VI: The Mackerels and Related Fishes," *The Hong Kong Naturalist: A Quarterly Illustrated Journal Principally for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Hong Kong) 7: 1 (Apr. 1936), p. 71.

<sup>83</sup> 筆者不才，竭力搜尋材料除臺灣外似未見，他處有稱康氏馬鮫鱈為「土魷」者。讀者若有發現，請不吝賜告。

當以上3種魚發現飛魚，後者馬上跳出水面並開始飛行……當牠們在飛的時候，另外這些魚就追在牠們後面，在水下跟著飛魚的影子，後者不久落入水中，另外這些魚馬上捕捉、吃掉牠們。<sup>84</sup>

以上的描述，荷蘭航海家豪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1565-1599）在十六世紀末於馬爾地夫群島南側航行時，也曾經目睹，他說：

飛魚……在水中被 Dorados，Bonitos，Albocares 所追蹤，假如牠們躍出水面，企圖用高速來擺脫這些魚逃生，牠們就會跳躍並高速游到前者將落入水面之處……。<sup>85</sup>

而在前述同時代的荷蘭醫務員龐蒂優斯的書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我喜愛這些屬於鮪魚一類的魚（如：Doraden，Carcavaden，Boniten），因為牠們的驚人泳速，可以追過滿帆前進的船，而且能躍出水面5-6荷呎，以捕捉飛魚。<sup>86</sup>

同樣的，作者又另說明：

有種稱為 Bonitae 的魚，每天都在市場裡出售，我可以這樣說，這是屬於鮪魚這一類的魚。爪哇本地人稱之為 Ican Bouda，就是馬魚的意思。這無疑是因為這種魚可以躍出水面達一個人的高度，又因為其泳速極快，能夠超越順風滿帆前進的船隻。<sup>87</sup>

以上四條記載，與《澳門記略》之引文對照，即可見荷蘭人（如前述航海家豪

---

<sup>84</sup> Antonio Pigafetta, *The First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1519-1522: An Account of Magellan's Expedi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 p. 20.

<sup>85</sup> Willem Lodewycksz, "De eerste boek van Willem Loede," in G. P. Rouffaer and J. W. Ijzerman, eds., *De eerste schapvaart der Nederlanders naar Oost-Indië onder Cornelis de Houtman, 1595-1597, Vol. 1*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15), pp. 52-53.

<sup>86</sup> Jacobus Bontius, *Oost- en West-Indische warande, vervattende aldaar de leef- en genees-konst: Met een verhaal van de speceryen, boom- en aard-gewassen, dieren &c. in Oost- en West Indiën voorvallende* (Amsterdam: Jan ten Hoorn, 1694), pp. 15-16.

<sup>87</sup> Jacobus Bontius, *Bontius Tropische Geneeskunde*, p. 259. 查印尼語並無馬魚，不知是否為漢語馬鮫誤譯？

特曼、醫務員龐蒂優斯) 除以荷蘭語稱馬鮫鱈為「國王魚」之外，也會採取葡萄牙語的稱法，稱鯖科魚類為 Dorade、Albocare 與 Bonite (其中應含括「康氏馬鮫鱈」)。對此，南非的魚類學者吉爾克利斯 (John Gilchrist) 亦同樣注意到，荷蘭人在指稱新種魚類時，會出現以多語來指稱單一魚種的現象。他以南非的例子說明，荷蘭人除了藉自己的母語來命名新發現的魚種之外，也會借用「多國水手混雜的語彙」(the vocabulary of the cosmopolitan sailor)。他並認定，像 Bonito 與 Albacore 之用語，即為荷蘭水手借取的魚名。由於是標音系統，後者衍生出種種不同的拼法，如 Albukure、Alfakoor、Albert-koord 或 Halfcord 等，甚至變化為 Carcavade。<sup>88</sup>

當代的歷史學者，根據該種魚類會追獵飛魚的習性，一般將 Dorado 比定為「魷魚」(Coryphaena hippurus，俗名「鬼頭刀」)；又根據其最大型的體態，將 Albarcore 比定為「黃鰭鮪」(Thunnus albacares)；而所謂的 Bonito，則被根據現在的俗名，比定為「鰹魚」(Thynnus pelamys)。<sup>89</sup> 這樣的見解，似乎排除了以上述種種名稱，或曾被用來指稱「馬鮫鱈」的可能。但筆者必須指出，過去的魚名與當代的魚名，其所指稱的涵蓋範圍常有參差，無法完全視為能一一對應、互斥且窮盡的關係。若僅從某種魚類會追逐飛魚的現象來判斷魚種，則所有鯖科魚類(鮪、鰹、鰹)都可被包含在內。雖然所謂「魷魚」追逐飛魚的生態，廣為人知，但飛魚作為食物鏈的下端，為上層食物鏈所有魚種的餌料，會獵捕飛魚的，並不限於魷魚。實際上，魷魚與鰹魚、鰹魚等，一面獵捕飛魚，一面也被更大型的鮪魚與旗魚獵捕。<sup>90</sup>

前述列舉的三種魚類，除了黃鰭鮪體型巨大，有兩隻細長的背鰭與臀鰭，可

<sup>88</sup> J. D. F. Gilchrist, "History of the Local Names of Cape Fish," *Transactions of the South Af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Capetown) 11: 1 (1900), pp. 216-217.

<sup>89</sup> Antonio Pigafetta, *The First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1519-1522: An Account of Magellan's Expedition*, p. 20, note 116.

<sup>90</sup> 高遠文化文字整理，〈賞鯨意外的驚喜：飛魚〉，《漁業推廣》(臺北) 296 (2011年5月)，頁 20-23。另，在佛羅里達沿岸的大耳馬鮫鱈，根據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的研究，也有捕食飛魚的紀錄。參見 Mark F. Godcharles and Michael D. Murphy,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Species Profiles: Life Histories and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of Coastal Fishes and Invertebrates (South Florida), King and Spanish Mackerel," *Biological Report* (Lafayette, Louisiana) 82: 11. 58 (June 1986), p. 13；在臺灣亦有人觀察確認土魷魚獵捕小型魚的食性，參見李嘉亮，《臺灣的水產》(臺北：渡假出版社，1991)，頁 145：「通常都靜靜浮於水面，隨海流漂動，順流而行，一發現獵物，立刻以極大的速度向前衝，一口將獵物咬著而吞下。較大的獵物，常被其銳利內彎的牙齒咬成兩截。」

明顯地與其他鯖科魚類作出區別之外，鯖魚與鰹魚的魚鱗型態及位置都較為近似。雖然現代魚類學將鰹魚與鯖魚分列為不同屬，但體型在一公尺以下的鰹魚與鯖魚，由於同屬鯖魚科，同樣有前、後兩背鱗，也同樣在背鱗與臀鱗後有排鱗（但較少，為 5 對，鯖魚則有 7-9 對），其外型其實非常類似。所以，在古代使用的泛稱中，鯖魚成魚與鯖魚幼魚之間，也存在著模糊的空間。鯧魚除頭頂隆起外，由遠方看來，體型與成年鯖魚差別不大。

1654 年，一位東印度公司醫務員黑克（Gijsbert Heeck，1619-1669），隨船由荷蘭前往巴達維亞。據他於書中描述，在前往南非的旅途上，所乘的船隻於南大西洋中捕獲了大量的 Boniet 魚。本書的註釋者，認為其所指稱的應為一種鯖魚。<sup>91</sup> 筆者則認為，不應逕指其為鯖魚，而應認為是鯖科的某種魚類。此外，此條記載仍然證明，在十七世紀中期，葡萄牙魚名 Bonito 確實已經為荷蘭水手所習用。

筆者認為，無論稱為 Bonito 或 Boniet，在亞洲海域中所指稱的，乃是鯖魚而非鰹魚，其最重要的證據如下。1672 年夏季，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 Return 和 Experiment 號，曾航越海南島附近海域，剛巧駛入 Boneta 魚群中，船員立即撈捕了 30 隻魚來食用。這裡所稱的 Boneta，應該也如同上述一樣，指的是鯖科的大型魚。而根據船員巴洛（Edward Barlow）手稿所留下描述 Boneta 追逐飛魚的圖像來看，如圖六所示其第二背鱗與臀鱗後面的 7-9 個排鱗，畫的非常清晰。從此一特徵看來，當時以 Boneta 用語所指稱的，便是「馬鮫鯖」。

此條證據說明，十七世紀晚期，這樣的葡萄牙語魚名稱法，即使在英國船上，也是通用無礙（前引圖上手寫筆跡亦拼成 Bonnetus，較近葡語發音，見下文）。<sup>92</sup> 前面已有證據證明，荷蘭水手亦使用葡語魚名，在臺灣，他們也應同前述英國水手一樣，比較偏好以葡萄牙語來稱呼「馬鮫魚」。如此，似可推論，荷蘭人水手與下層官員很可能習慣以 Bonito 或 Dorado 用語，來泛稱包括「康氏馬鮫魚」在內的鯖科魚類，外加不屬鯖科魚類的鯧魚。

<sup>91</sup> Gijsbert Heeck, *Een Bunschoter VOC-chirurgijn, 'Daglijkse aantekeningen' van de reis naar Oost-Indië in 1654 door Gijsbert Heeck (1619-1669)*, O. Dekkers, ed. (Bonschoten: Historische Vereniging Bunschote, 2001), p. 47.

<sup>92</sup> Edward Barlow,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Vol. 1*, Basil Lubbock, trans. & ed. (London: Hurst & Blackett, Ltd., 1934), p. 215.



圖六 巴洛手稿中描繪 Boneta 魚追逐飛魚的情狀

圖片來源：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London, L4309-007.

此點正與「土魷」一詞一開始出現於漢文文獻的記載相符。土魷出現於漢文文獻初期，並非稱為「土魷」，而是先稱「泥鱸」，後來「泥鱸」／「土鱸」並稱，最後固定為「(塗)土魷」(見下文)。在蔣毓英所編纂的《臺灣府志》中，稱為「泥鱸」。<sup>93</sup> 臺灣府學教授林謙光之《臺灣記略》〈物產〉有言：「泥鱸、烏魚，出於坑仔口、打狗港」。到了 1741 年，劉良璧所編纂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當中，已稱之為「塗魷」。<sup>94</sup> 同時，十八世紀的日本學者平澤旭山(又稱平澤元愷，1733-1791)，在其《魚名錄》一書(約 1784 年完成)中，對此同物異名的情況，亦有所記載：

サワラ，沙窠辣，馬鮫魚無疑。俗用鱒字固不當，或用鱒、又鱒，皆不當。  
[即]魷鮫([出於]臺灣府志)；泥鱸魚，阿吉沙窠辣([出於]臺灣府志)；土  
鱸，同、俗語。<sup>95</sup>

<sup>93</sup> 蔣毓英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50。

<sup>94</sup> 劉良璧纂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74 種，1961；1741 年原刊)，頁 119。

<sup>95</sup> 平澤元愷，《魚名錄》(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索書號：特 1-2017。異名同書《波臣小譜》完成於 1784 年，故推定此書大約完成於 1784 年之前。

此條記載明確指出，在十八世紀的華南閩粵語中，「馬鮫魚」指涉的範圍，含括了臺灣的土魷魚。平澤旭山可能知道土魷魚身上有直條斑紋，外觀上與一般稱為「馬加」的「中華馬鮫鱈」稍有不同。所以，在日語部分，還標示了「阿吉沙窠辣」此一特稱。他又在〈浦瓊偶筆〉（約成書於1774-1775年間）卷七，將之以假名標示為「ヲキサワラ：本名泥鱈，俗呼土鱈」。<sup>96</sup> 可為一旁證。又1766年出版之《小琉球漫誌》中，作者朱仕玠也指出「塗魷」，一名「泥鱈」。<sup>97</sup> 或許「土鱈」出於某種原因被轉換為「塗魷」，也可能「土鱈」本來就有「塗魷」這個俗名。<sup>98</sup>

「泥鱈」／「土鱈」兩種稱法是否與荷治時期對「馬鮫鱈」的稱法有關呢？前面已經論證。荷蘭水手應是取葡萄牙語 Bonito 與 Dorado，來指稱中型鯖科魚類，特別是鱈魚，且包括非屬鯖科的鱈魚。Bonito 以葡語發音時，則最末音節 o 發 u 音。<sup>99</sup> 倘若從發音到書寫的傳遞演變過程中看，第一個音節 bo 被遺落，其發音 ni-tu 就與土魷的原名閩音「泥鱈」類似。<sup>100</sup> 另外，Dorado 一名，最後音節也一樣會將 o 發 u 音。若 ra 音被省略（如「土仔鱈」省略「仔」），則僅發 do-du 音，與閩音「土鱈」類似。<sup>101</sup> 這種音節縮減的情況下，若以西班牙語發音，則 u 即仍發 o 音，do-tu 發成 do-to，則與閩音「塗魷」／「土魷」類似。

筆者因此推測，「土魷」魚名是荷蘭人挪用葡萄牙語魚名所造成的結果。荷治時代，居住於安平的居民、具備雙語能力的通事，多有同時使用西班牙語跟葡萄牙語的情形。<sup>102</sup> 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官員雖然在對上呈報的文書以荷蘭

<sup>96</sup> 新村出輯，《海表叢書：南蠻紅毛史料》（京都：更生閣，1930），第2冊，頁143。

<sup>97</sup>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文叢第3種，1957；1765年原刊），頁94。

<sup>98</sup> 論者或以為「鱈」與「魷」讀音相同。但考諸文獻，沒有任何將「泥鱈」寫為「泥魷」的記載，故筆者對此說法有所保留。此外，坊間亦有人報導，「土魷」在漁民間仍有發音為「土禿」者，或許「禿」正保留了「鱈」的讀音。參見李嘉亮，《臺灣魚達人的海鮮第一堂課》（臺北：如果出版社，2007），頁131-132。

<sup>99</sup> Milton M. Azevedo, *Portuguese: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rd edn., 2012), p. 41.

<sup>100</sup> 這種情況確有相似實例。如呂宋島北端巴丹群島的依巴雅特島 (Itbayat)，在《東西洋考》〈舟師考〉記載為「筆架」山。「筆架」其閩音為「pit-kà」，便是將開頭音節「It」略去的結果。

<sup>101</sup> 這種情況確有相似實例。如呂宋島西北端的博加多角 (cape Bojeador) 在《東西洋考》〈舟師考〉記載為「白土」角。其閩音為「péh-thóo」，便是將中間音節「ja」略去的結果。

<sup>102</sup> 史料中記載，居住於安平而能使用葡萄牙語的漢人通事有4位：Hambuan, Kambing, Jacomo, Siamsjack。參見 VOC 1182, Resolutiën van Willem Versteegen enz. op de vojagie van Batavia naer Tonquin, Tayouan en Quinam gehouden, 't sedert 11 Maij tot 10 December 1651, Taiwan (11 Mar. 1651-10 Dec. 1651), fo. 164<sup>r-v</sup>. 14 Sept. 1651. 而能使用西班牙語的漢人通事有1位：Alfonso Patchieko。參見 VOC 1149,

語「國王魚」來表示馬鮫鱈，但在日常生活中，以葡萄牙語 Bonito、Dorado 來跟通事、僑領指稱此魚，乃是相當自然之事。荷蘭當局徵收「國王魚」稅收時，如同前一小節的論證，顯然是針對當代分類為馬鮫鱈的魚類（包括「康氏馬鮫鱈」）徵稅。而荷蘭水手使用葡萄牙語 Bonito、Dorado 指稱馬鮫鱈，本來語意上較為寬泛，應該也包括魷魚在內。設想熱蘭遮城唐人市民以馬鮫鱈報稅，而荷蘭水手與低階人員咸指其為 Bonito 與 Dorado，在此，兩魚遂限於指稱馬鮫鱈，而排除了「魷魚」的意涵。

之後，可能因為臺灣西部漁場所捕獲的「康氏馬鮫鱈」，確實較其他種類馬鮫鱈常見，但其背上斑紋與「中華馬鮫鱈」明顯不同，可以與其他多種馬鮫區別，另外得名。<sup>103</sup> 故華南的文人官員接受「泥鱸」／「土魷」作為特稱，也不能說沒有理由。Bonito 與 Dorado 遂被漢語接受為「泥鱸」與「土魷」。其中，Bonito（泥鱸）既然在十七世紀晚期（如英國東印度公司船員巴洛之例）指稱馬鮫鱈的情況越來越普遍，Dorado（土魷）就被當成俗稱（如同平澤元愷所記載）。但至十八世紀後半期，可能因為「鱸」這類臺灣自創字體，不如借自中國的「魷」字受到青睞，「土魷」占了上風，之後，「土魷」成為眾人所知的魚名，原先的「真名」反而被遺忘。<sup>104</sup>

## （二）土魷與「南蠻料理」

前面的引文中，已經提到荷蘭人非常喜歡馬鮫鱈的味道，而在印尼多會將之醃漬，作為由巴達維亞前往香料群島中的補充糧食。這裡則引用龐蒂優斯所記載醃漬 Dorado 的方式如下：

---

Vervolgh van de resolutiën des Casteel Zeelandia, Taiwan (20 Mar. 1645-16 Nov. 1645), fo. 881<sup>r</sup>. 20 June 1645.

<sup>103</sup> 康氏馬鮫鱈成魚「體側有 50-60 條波形黑色橫帶」，而中華馬鮫鱈則「體側上方具 10-12 條之不規則黑色窄橫帶」。

<sup>104</sup>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頁 95。「塗魷，魚名，一名泥鱸。考字書無鱸字，系台地訛字。」由此可知本書完成的 1765 年左右，「土魷」之稱已漸漸取得上風。總之 Bonito、Dorado 兩種魚名作為馬鮫鱈的兩種別名，如何轉化為專指康氏馬鮫鱈，又如何能在「泥鱸」、「土鱸」、「土魷」、「塗魷」間轉換，可能有種種不同的路徑。本文所提出的僅是就目前所知證據，能合理推論的一種。其他種種可能尚待更多證據出土。例如，「鱸」與「魷」是否同音？「泥」與「土」是否因為語意指稱同一而能相互轉換？此間筆者尚無答案。

首先滾煮魚肉到半熟，然後用油、醋、胡椒、洋蔥、鹽跟其他一些香料放在一起醃漬，讓牠能保存較久的時間，……用這個方式醃漬後，口味非常好。而醃漬的液體，可以用來當成醬料，令人胃口大開。不過要小心，必須跟足夠大量的蒸熟米飯一起食用，不然就會在腸子裡引發灼熱感。<sup>105</sup>

這種將肉稍微滾熟，然後以油和醋醃漬的處理法，可以稱之為「油煎醃漬魚」。主要是利用醋當成酸性介質與油來防腐，是地中海盛行保存魚肉的辦法。語言學家任韶堂（Dan Jurafsky）追索過此一菜色於全球流傳的軌跡，指出十五世紀後，此種菜色於西班牙、葡萄牙都甚為流行，主要作為天主教大齋期（lent）的菜色使用，西班牙語稱為 *escabeche*。因應各地的需要，內容成分有不同的變化。任韶堂並指出，類似的菜色也由澳門耶穌會士傳到日本，記載於約 1639 年成書的《南蠻料理書》中。在葡萄牙，通常會將魚肉裹粉炸熟後再依樣處理。學者們認為，這一道菜應即是日本「天婦羅」的濫觴。<sup>106</sup> 以上引文雖為荷蘭醫務員龐蒂優斯於爪哇的經驗，但既屬同一時期，在日本也流行過此種食用方式，故很可能也被在大員熱蘭遮市鎮的唐人與荷蘭人所採用。<sup>107</sup>

誠如前述，近年來的科學史研究注重觀察歐洲擴張史脈絡下，在異文化交會背景中，人與動物關係再定義的問題。其中，有關可食與否、誰應食用，則落入殖民者自我定義認同的重要文化範疇。<sup>108</sup> 前文已經指出，在荷治時期，無論唐人或荷蘭人，都是土魷的消費者。在臺灣的唐人，並不像在馬尼拉的唐人，仍稱康氏馬鮫鰭為「馬鮫」，而是採納了荷蘭人挪用的西班牙、葡萄牙語稱法，稱之為「泥鱸／土魷」，此一用語，反映了熱蘭遮市鎮存在著唐人與荷蘭人共同消費土魷魚的市場。這個稱法留存於漁民之間，則顯示其對於安平漁獲買主的重視

<sup>105</sup> Jacobus Bontius, *Bontius Tropische Geneeskunde*, p. 261. 此處所指 Dorado，從文中敘述了其頭部的特徵，應指鱈無誤。

<sup>106</sup> 任韶堂（Dan Jurafsky）著、游弈庭譯，《餐桌上的語言學家：從菜單看全球飲食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 65-71。

<sup>107</sup> 任韶堂引用艾力克·拉斯（Eric C. Rath）的研究指出，當時天婦羅的前身，是將魚肉切塊、裹上麵粉後油炸，然後配上蒜泥浸入熬煮過的高湯一起食用的料理。筆者以為與臺灣街頭目前流傳的土魷魚羹似頗有共同之處。兩者是否有關，則有待學者研究之。參見 Eric C. Rath, *Food and Fantasy in Early Modern Japan*, pp. 103-106.

<sup>108</sup> Rebecca Earle, *The Body of the Conquistador: Food, Race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in Spanish America, 1492-1700*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5, 154-155, 181-186.

程度，並不少於華南市場的買主。

或可認為，「土魷」此種俗稱的出現，正表現了殖民交會脈絡下，呼應了荷蘭殖民者與定居唐人市民的需求，開始將臺灣近海漁獲，導向本地市場出售的現象。對於歐洲人而言，食用土魷，只是將歐洲飲食習慣延伸到臺灣的其中一種發展；但對於在臺灣的唐人居民來說，食用土魷，卻代表了接納歐洲的飲食習慣，開發一種新的經驗。這可能也是清領之後，「土魷」之名仍然留存，未被「馬鮫」所取代的原因之一。

## 四、東洋針路末端的虱目魚養殖

臺灣虱目魚進入近代魚類分類，被登錄學名為 *Chanos Chanos*，首見於 1902 年美國國家博物館館刊。此前，有兩批有關臺灣的魚類標本，由松原新之助一起轉交給美國國家博物館。其一為動物學家多田綱輔收藏於東京大學，另一批則為農林漁產講習所所長松原新之助為辦理漁業展而收藏。其後，這兩批標本於 1902 年由前述 David Starr Jordan 與 Barton Warren Evermann 教授編目。其中，有 3 隻虱目魚標本，分別取自於宜蘭、臺北還有東引（Toii）島。<sup>109</sup> 當時，美國人剛接掌菲律賓殖民地不久，很快地，發現了養殖虱目魚的價值。1908 年，一位中學自然科教師卡本特（William D. Carpenter）在馬尼拉周邊調查虱目魚的養殖情況，並希望藉此研究，迅速推廣此一生產事業。<sup>110</sup> 其研究報告附錄，大體上將 1775 年以來生物學者對於虱目魚在世界各地被採集與分類的情況，逐筆表列。他並採集了虱目魚在各地的俗名，如在臺灣，即稱為 Sabahi。<sup>111</sup> Carpenter 收集了當地以塔加洛（Tagalo）語寫成的資料，將商業性畜養虱目魚事業的起源，上溯至 1863 年。他認為，在此之前，菲律賓雖有虱目魚養殖的情況，但並不盛行。這說明了，

---

<sup>109</sup> David Starr Jordan and Barton Warren Evermann, "Notes on a Collection of Fishes from the Island of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Washington) 25: 1289 (Sept. 1902), p. 327.

<sup>110</sup> William D. Carpenter, "The Milkfish or Bangos (*Chanos Chanos* Forskal), its Culture in the Fish Ponds about Manila Bay and the Gulf of Ligayen, Island of Luzon," *Bulletin, Bureau of Education* (Manila) 28 (1908), pp. 1-23.

<sup>111</sup> William D. Carpenter, "The Milkfish or Bangos (*Chanos Chanos* Forskal), its Culture in the Fish Ponds about Manila Bay and the Gulf of Ligayen, Island of Luzon," p. 23.

即便自然環境適合發展養殖事業，也不表示當地居民會偏好選擇養魚甚於捕魚。

與菲律賓相對照，在臺灣，根據曾品滄的推測，最早有一定規模養殖虱目魚的記載，則始於東寧鄭氏時期。曾品滄認為，蔣毓英編纂之《臺灣府志》（1685）雖然沒有提到畜養虱目魚的情況，但記載了「草埔五塢」魚塢的存在。而之後數年，高拱乾編纂之《臺灣府志》（1694）則註記，「草埔五塢」確實產出虱目魚。曾品滄因此推測草埔五塢養殖虱目魚的情況，應於東寧鄭氏統治末期已存在。<sup>112</sup> 論者或以為蔣志中未曾正面表列畜養虱目魚的情況，故對此推測仍有疑慮。

筆者認為，蔣毓英雖未指出虱目魚畜養的情況，卻對虱目魚的生態有確切的描寫，值得注意。蔣志指出：「麻虱目水波化生，倏而大，倏而無。」<sup>113</sup> 對照同樣列於〈鱗之屬〉的其他魚類描寫，或有描寫其外型，或有描寫其產地，虱目魚卻兩者皆無。這可能表示，虱目魚的產地與外型，皆不如此一特色具有識別性。這是因為在古代，任何魚類在其棲地，總會週期性的保持一定的數量，撈捕時，一定能區分母代與子代。但虱目魚卻非運用種魚繁衍，而是定期到岸邊撈捕魚苗來畜養。<sup>114</sup> 這種養殖方式，只要岸邊魚苗不竭，就無須畜養種魚。既然觀察不出母代與子代的關係，從撈捕魚苗的慣行，判斷其為「水波化生」，亦頗為合理。而虱目魚的養殖，也不必因為保留種魚而每季連續不斷，淡季可以不養，故曰「倏而大，倏而無」。「大」與「無」，應指其數量。也就是說，其產量可以一季甚多，也可一季不養。所以，既然蔣毓英有此觀察，就表示當時已有人掌握了畜養虱目魚的技術，只是在修志當時，未必正在畜養而已。根據這個解讀的方式，筆者支持曾品滄的推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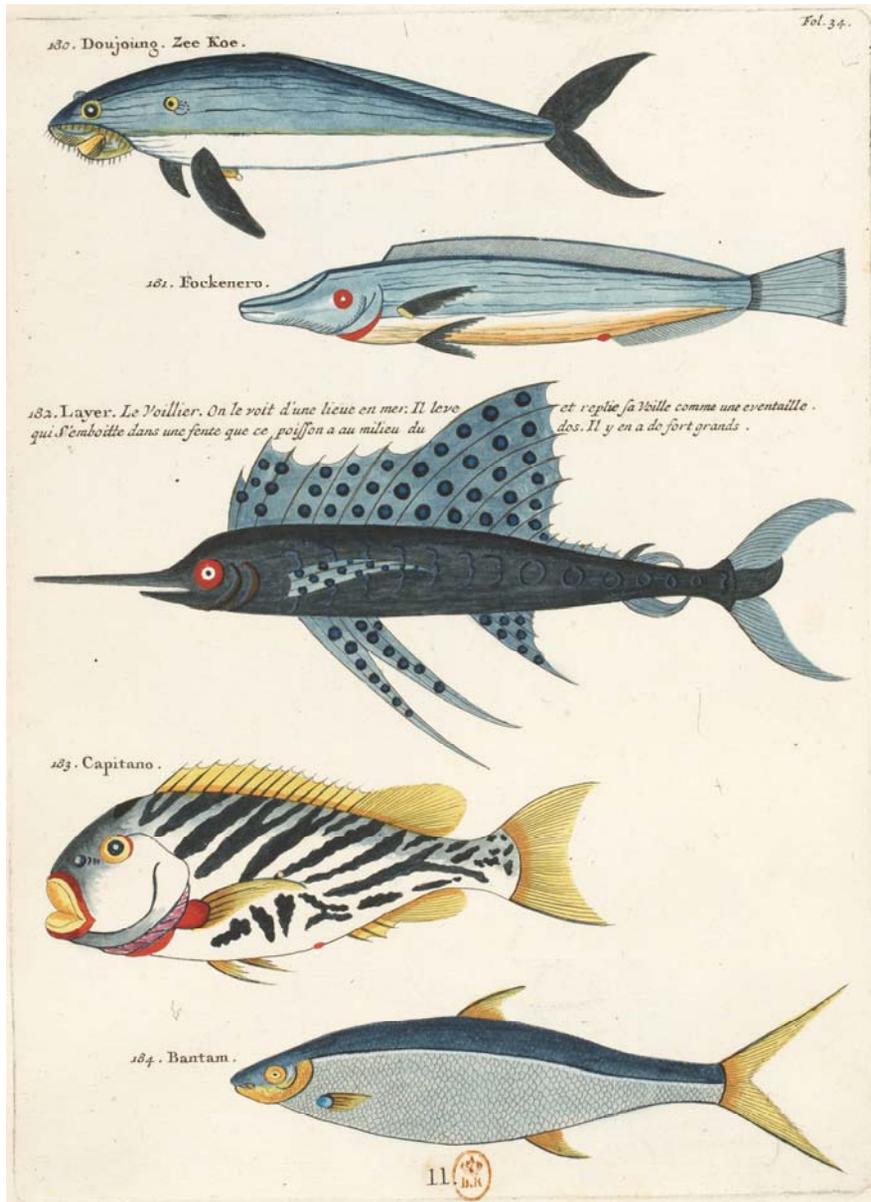
在爪哇，商業性畜養虱目魚的情況，起源甚早。根據《荷屬東印度百科》（*Encyclopaëdie van Nederland Indië*）的記載，爪哇東部沿岸 Sidayu、錦石、泗水到 Bangil 之海灘，為鹹水魚塢養殖發展最早之處，其開端已不可考。<sup>115</sup> 在萊福士（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 1781-1826）所著《爪哇史》（*The History of Java*）一書提及，1490 年 Pajang 王國之蘇丹曾命人於錦石建造魚塢，後來一直

<sup>112</sup> 曾品滄，〈塢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頁 7。

<sup>113</sup> 蔣毓英修，《臺灣府志》，頁 51。

<sup>114</sup> 莊健隆，《臺灣魚故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24、26。

<sup>115</sup> Pieter Antonie Lith, A. J. Spaan, F. Kokkens, and Johannes François Snelleman, comp., *Encyclopaëdi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Vol. 4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06), p. 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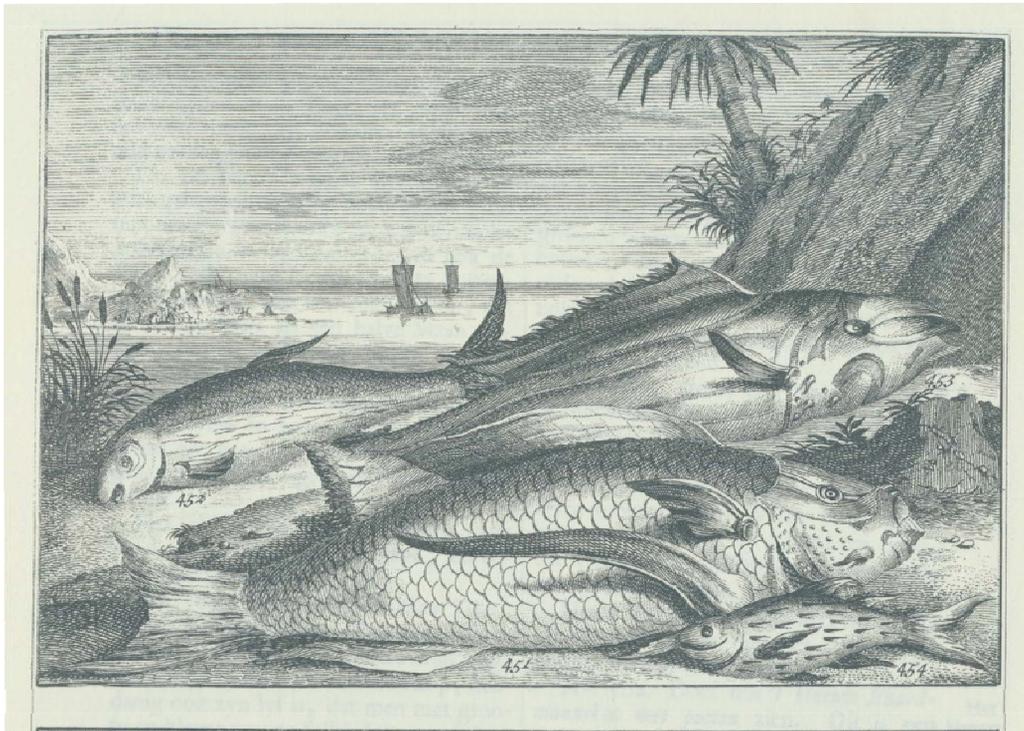


圖七 雷納德《摩鹿加及其南方海岸魚類、小龍蝦與蟹類之彩色圖繪》當中的虱目魚附圖

圖片來源: Gallica.bnf.fr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授權。Louis Renard, *Poissons, écrevisses et crabes, de diverses couleurs et figures extraordinaires, que l'on trouve autour des îles Moluques et sur les côtes des terres australes: peints d'après nature* Durant la régence de messieurs van Oudshoorn, van hoorn, van Ribeeck & van Zwooll, successivement gouverneurs-généraux des indes orientales pour la Compagnie de Hollande, p. 7.

作為養殖虱目魚用，可說是最早的文字記載。<sup>116</sup> 1852年，荷蘭的魚類學者布萊克爾（Pieter Bleeker，1819-1878）發表了對小巽他群島與摩鹿加群島魚類分類研究。當時，他記載虱目魚的馬來語與爪哇語俗名，均為 Ikan Bandang，而他據魚名發音與魚體特徵推定，前述雷納德所出版圖鑒中編號 184、標示為 Bantam 的魚類，即是虱目魚（參見圖七）。<sup>117</sup>

由於此圖鑒摹自巴爾塔札·揆一的收藏，而同一藏品大部分均為華倫坦在撰寫《新舊東印度誌》一書所引用，故同樣的圖形，也由華倫坦另外出版如下（參見圖八，標示為 452 者）。



圖八 華倫坦《新舊東印度誌》書中虱目魚圖形

圖片來源：Francios Valentijn,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Vol. 3, pp. 502-503.

<sup>116</sup>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The History of Java*, Vol. 2 (London: Black, Pabury and Allen, Booksellers to the Hon East - India Company, 1817), p. 143.

<sup>117</sup> Pieter Bleeker, "Bijdrage tot de kennis der Chirocentoidei, Lutodeiri, Butirini, Elopes, Notopteri, Salmones, Echeneoidel en Ophidini van den Soenda-Molukschen Archipel," *Verhandelingen v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Jakarta) 24 (1852), p. 11.

華倫坦可能根據前述資料，對此圖說介紹如下：

這圖可看見萬丹鮭魚(Bantamsche Salm)的樣子。這種鮭魚的長度和外型，跟我們的差不多。可是牠的鰭，還有兩邊分叉的尾鰭，都有紅跟白色的邊。還有，倘若煮熟，牠是白色而非紅色。很肥腴也很美味。<sup>118</sup>

前述的東印度公司醫務員龐蒂優斯也曾品嚐過虱目魚，他的評論如下：

有某種被捕捉的鮭魚，那些麻六甲來的人稱之為 Ican Banda，他們說這也是因為這個魚是從班達島進口的，在那裡的海灘，可以大量捕獲這種魚。確實牠跟鮭魚除了顏色以外，沒什麼不同。因為這魚是白色而非紅色，而且我們的比較瘦一些，所以若信普利尼所言的話，[我們的鮭魚]會比較有益健康。<sup>119</sup>

由以上引文可推知，至少從十七世紀初開始，在爪哇東部、小巽他群島及摩鹿加群島海域，虱目魚已經是很普遍的食用魚。前面引用 1754 年 6 月 21 日，在巴達維亞頒布的告令，除了馬鯪鰭以外，也提及了虱目魚(Ikan Bandeng)的名稱。<sup>120</sup> 這可為十八世紀時巴達維亞城的居民普遍食用虱目魚的證明。布萊克爾在其報告中還指出：「這是一種在爪哇因為美味而廣為人知，而且假如刺少一些的話，會成為最受歡迎的魚類」。<sup>121</sup>

荷蘭人很早即有享用此魚的記載，但不知其出自養殖或撈捕。自當時歷史觀之，由於東爪哇馬泰蘭王國勢力頗大，十七世紀時，荷蘭人活動的範圍，多限於巴達維亞城與安汶群島附近，無法接近東爪哇魚塭產地。十八世紀以前，荷蘭人對於東爪哇的漁業情況所知相當有限，也沒有留下目擊當地運用魚塭養殖虱目魚的記載。臺灣受荷蘭統治時間為 1624-1662 年，在這段期間內，荷蘭人在爪哇島

---

<sup>118</sup> François Valentijn,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Vol. 3, p. 494.

<sup>119</sup> Jacobus Bontius, *Oost- en West-Indische warande, vervattende aldaar de leef- en genees-konst: met een verhaal van de speceryen, boom- en aard-gewassen, dieren & c. in Oost- en West Indiën voorvallende*, pp. 15-16.

<sup>120</sup> J. A. van der Chijs, comp.,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Vol. 6, p. 679.

<sup>121</sup> Pieter Bleeker, "Bijdrage tot de kennis der Chirocentoidei, Lutodeiri, Butirini, Elopes, Notopteri, Salmones, Echeneoidel en Ophidini van den Soenda-Molukschen Archipel," p. 11.

的勢力，均未曾擴及前述出產虱目魚的海域，而多是進口其漁產。據此推論，臺灣以魚塭畜養虱目魚的技術，不太可能是由荷蘭人自爪哇引進。而馬來語系統之虱目魚稱法 *Ikan Bandang* / *Bandeng* 沒有傳入臺灣，或可引為一旁證。另外，前文第二節也提到，荷蘭人自 1640 年代起，即淨空海岸 1 荷哩的範圍，不許唐人居住。而爪哇鹹水魚塭，多位在河口沙灘處，不能離開海岸邊太遠。在荷蘭的淨空海岸政策下，似未有唐人於臺灣海岸建造魚塭、搭蓋漁寮照看的可能。倘若要由東爪哇居民與臺灣唐人的接觸來推斷此種畜養技術的移轉，則必須考慮其他的可能性。

由於菲律賓呂宋島，距離臺灣，僅一海之隔，既然在臺灣開始畜養虱目魚的時間，顯較菲律賓為早，不太可能由菲律賓傳入相關養殖技術。可以思考的是，臺灣唐人是否早已由菲律賓人處，習得食用野生虱目魚的經驗？要探討此一問題，似必須對於呂宋島野生虱目魚的撈捕與消費情況稍做調查。

英國航海家包令爵士 (John Bowring) 曾經於 1858 年探訪菲律賓，並觀察當地的漁業。他提到一種被稱為 *Sabalo* 的魚。根據前述卡本特之整理，*Sabalo* 也是虱目魚的俗名之一：

大量的本地人以捕魚為生。最被稱道的，是一種被稱為 *Sabalo* 的魚，可以在塔阿爾 (Taal) 湖撈獲。當 *Sabalo* 離開此湖前往大海的季節一到，[居民] 就會在河流中間，樹起竹子做的陷阱，其頂面，懸在水面上 5-6 英尺高，兩兩被裝在一個竹子平臺上。魚躍出水面，跳過第一道障礙，就會掉在竹子平臺上，然後被捕獲。有些大小與鮭魚相同。<sup>122</sup>

3 年後，又有普魯士王國的自然調查團船隊，於 1861 年 5 月 19 日前往塔阿爾湖從事調查。當地人也同樣告知該調查團，在此可捕得一種稱為 *Sabalo* (虱目魚) 的海魚，這是菲律賓群島最美味的魚類，他們也捕得了一條此種虱目魚。<sup>123</sup> 其後，他們轉往 *Pansipit* 河，因為此河由塔阿爾湖流向大海，據稱，全年都能捕得虱目

<sup>122</sup> John Bowring, *A Visit to the Philippine Islands*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59), pp. 163-164.

<sup>123</sup> Eduard von Martens,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nach amtlichen Quellen. Zoologischer Theil, Vol. I* (Berlin: Königlichem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 [R. v. Decker], 1876), p. 200.

魚。<sup>124</sup> 透過此處實地調查經驗的紀錄，印證了前述包令爵士的記載。

由於十九世紀中期科學調查風氣盛行，讓歐洲人產生記載此類採捕活動的興趣，方有以上記載的留存。但從虱目魚的生態（迴游到岸邊產卵）與塔阿爾湖的自然環境來看，此種撈捕活動，應早於此，已存在相當時日。例如，在法國海軍軍官桑夸（Fé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 1767-1840）的航海記中，即曾提及菲律賓特產的魚類為 Tanguingui（土魷）及 Sabulo（虱目魚）。<sup>125</sup> 他本人大約於 1806 年春季抵達當地。根據此條記載，菲律賓撈捕野生虱目魚的活動，顯然遠比其畜養的活動更為古老。據此，也可推測，十七世紀時，馬尼拉的唐人居民與西班牙住民，都曾經食用過虱目魚。

此前，本文即已提出，在大員熱蘭遮市的唐人市民，多與澳門、馬尼拉的唐人住民有所交流。特別在語言上，共通使用葡萄牙語與西班牙語。Sabalo 一詞，本來是西、葡語中習用的魚名，西班牙人假借了地中海、中美洲的魚類名稱，用以指稱虱目魚。在這樣密切交流的互動氛圍中，不難想像，倘若大員唐人市民食用了在臺灣海域所捕獲的虱目魚，同樣地，也會接納、沿用該地以西班牙語 Sabalo 來指稱之用語。水產專家林明男曾推測，虱目魚的名稱來自西班牙語 Sabado。透過食物流傳的角度追索，筆者贊同此一看法。<sup>126</sup>

此前，本文即已推論，畜養虱目魚的技術，不太可能是透過荷蘭人傳入臺灣的，而十七世紀晚期，具有此一技術的區域，是東爪哇地區。那麼，其後，鄭氏集團的人員是否有可能將此技術，由東爪哇或其他地點帶回臺灣呢？從現有歷史文獻來看，鄭氏集團與東爪哇雙方，確實存在著交流這種技術的接觸機會。

1669 年，東寧鄭氏集團首領「嗣封世子」鄭經，曾致書東南亞各港埠君主，邀請他們前往安平港貿易。約在 1670 年，萬丹蘇丹手下一位唐人港主 Ki-nabbi，曾響應此一邀請，派船前來臺灣，雙方隨後展開合作。1672 年，臺灣方面派遣兩艘船隻抵達東爪哇沿岸，據信，這是鄭經透過 Ki-nabbi 希望在當地訂購船隻。而依其預定

<sup>124</sup> Eduard von Martens,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nach amtlichen quellen. Zoologischer Theil, Vol. 1*, p. 201.

<sup>125</sup> Fé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 *Voyage commercial et politique aux Indes orientales, aux îles Philippines, à la Chine: avec des notions sur la Cochinchine et le Tonquin, pendant les années 1803, 1804, 1805, 1806 et 1807, Vol. 2* (Paris: Clament frères, 1810), p. 42.

<sup>126</sup> 莊建隆，《臺灣魚故事》，頁 6-7。

新造的船隻，將載運萬丹貨物，在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的護航下，歸返臺灣。<sup>127</sup>此一行動，雖為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所偵知，但臺灣與萬丹方面的合作，至少曾進行到 1670 年代末期。據此，或可推測，東寧鄭氏的技術人員不但曾與東爪哇的造船師匠間有所聯繫，或許還曾居留當地數年。

相對地，文獻上確實記載，曾有馬來人在此時刻，開始前往臺灣居住。1689 年，亦即東寧政權投降後 6 年，有一位居住於廈門的馬來人，向荷蘭東印度公司商館人員請願，希望歸返家鄉。他自稱原先是巴達維亞的居民，在 1669 年前後搭乘唐船前往馬尼拉，卻因颱風被吹到臺灣。之後，他被東寧當局逮捕，在這段時間裡被收為奴隸。東寧覆滅後，他則被清方人員送到廈門收容。姑不論此人所自白之情節是否真實（因當時違法交流者，多託言肇因於風災），東爪哇的馬來居民透過東洋針路，可以與臺灣方面聯繫，則為各方所共認，而雙方人員交流，也確實存在。<sup>128</sup>

在這種交流中，鄭氏的人員應該會注意到東爪哇興盛的虱目魚養殖業。此外，如同前述第二節，荷蘭人統治臺灣時，採取西南沿海淨空政策，不許唐人居住，鹹水養殖應無法發展。但此一淨空政策，到了鄭氏統治時代，應已被撤除。曹永和曾列舉一份 1691 年簽訂的契文，作為旗後地區自 1673 年後即已開始開拓的證據。<sup>129</sup>契字中，稱當時因颱風意外入港，遂有開拓之舉。其實，清軍於 1644 年入關時，華南許多方志出於政治考量，為避禍計，根本不載 1644 年後至清軍占領平定的某年間，非屬清廷統治時期所發生的事蹟。曹氏所舉契文，恐怕也是依託颱風，規避先民曾投入鄭氏帳下的事實。這或者能當成 1670 年代東寧與清廷間對峙和緩之際，東寧政府開放了海岸沿岸地區占住的一個例證。而這個時機，也正巧與前述臺灣與東爪哇間於造船事業展開密切交流的時期重合。

從上述種種「情況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看來，推論大約在 1670

<sup>127</sup> Wei-chung Cheng,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Leiden: Brill, 2013), p. 238; Claudine Salmon, *Ming Loyalists in Southeast Asia: As Perceived through Various Asian and European Record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4), p. 63.

<sup>128</sup> VOC 1453, Rapport van de ondercoopliden Alexander van 's Gravenbroeck, Jan Tarant et cetera wegens haere negotie tot Aijmuij aen haer hoog edelens tot Batavia overgelevert in dato 8 Januarij 1689, Canton (8 Jan. 1689), fo. 294<sup>r</sup>.

<sup>129</sup> 曹永和，〈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補說〉，頁 250-251。

年代中晚期，隨著臺灣西南海岸地帶的占住發展，以及東爪哇鹹水魚塢養殖技術的引進，唐人已在臺南沿岸展開虱目魚之養殖，是一個尚稱合理的假說。而虱目魚之魚名，應來自於荷蘭時代熱蘭遮市鎮（或稱「臺灣街」）唐人市民與馬尼拉的密切關係，由此路徑接納了西班牙語之稱法 Sabalo。但以鹹水養殖虱目魚的技術，無論在當時中國沿海或是菲律賓群島，都非常罕見。據此推論，此一技術可能來自東寧鄭氏人員與東爪哇人民的交涉，或是因鄭氏人員在當地受到啟發。但倘若當時的臺灣已經習慣以虱目（Sabalo）之用語來稱呼此種魚類，便不會再採取印尼語 Ikan Bandeng 的稱謂為其新號。

在清領初期方志中的記載，常稱此魚為「麻虱目魚」，或逕稱「麻虱目」。這可能也必須從東寧鄭氏與萬丹往來情況中，推斷其原因。<sup>130</sup> 如同前述，土魷魚的原音 Dorado，本身其實已是一種魚名，在借用為外來語「土魷」時，卻必須在詞尾添加「魚」一詞來補足辭意。很可能，原來的「虱目魚」，除了「虱目」以外，也有「麻虱目」這樣的稱法，只是添上「魚」字來補足辭意。如此，「麻虱目」的原音，本來應已充分表達了魚名。一般存留文獻中，咸認「麻虱目」與「虱目」中的「虱目」，乃是一致的稱法。<sup>131</sup> 根據「虱目」轉借自 Savalo 這個推論來看，「麻虱目」這樣的稱法，有可能是馬來語系統中「後位修飾法」所造成的表達方式。換言之，Savalo 一語，可能先被某種馬來語系語言借用為形容詞「虱目」，以形容其主要詞彙「麻」，才形成「麻虱目」的表達法。此一馬來語系統的表達法，又被漢語所保留，成為「麻虱目」，於是出現漢語直接借自西班牙語 Savalo 的「虱目」，與透過某種馬來語言、借用西班牙語 Savalo 為形容詞的「麻虱目」，兩種並行的稱法。例如，前述爪哇語虱目魚名為 Ikan Bandeng，又稱 Ikan Banda，都是用魚名（Bandeng、Banda）來形容名詞「魚」（Ikan）這個字。前述東寧鄭氏人員與萬丹、爪哇往來時，除了西、葡語之外，也可能使用馬來語系統的語言。在此語言中，「麻」字可能是用「虱目」來修飾的名詞「魚」。

張燮所著《東西洋考》一書中，記載了十七世紀初期唐人船隻一般商務航行

<sup>130</sup> 蔣毓英修，《臺灣府志》，頁 36、51，各自稱為「麻虱目魚」與「麻虱目」；李丕煜主修、陳文達等編纂，《鳳山縣志》（文叢第 124 種，1961；1720 年原刊），頁 32、117，稱「虱目魚」及「麻虱目」；李元春，《臺灣志略》（文叢第 18 種，1958；1835 年原刊），頁 40，稱「虱目」。

<sup>131</sup> 連橫曾採錄「麻薩末」寫法，但「虱目」與「薩末」臺語發音類同，故應為同音異字。參見連橫，《臺灣語典》（文叢第 161 種，1963；1957 年原刊），頁 74。

的範圍與航線。其東洋航線，由廈門經澎湖、臺灣南下呂宋、民答那峨，止於摩鹿加群島或婆羅州。而無論欲由摩鹿加群島或婆羅州前往爪哇東部，都必然經過西里伯斯。十七世紀時，掌控西里伯斯與東爪哇間海域的是著名的布吉斯人（Bugis）。1667-1669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拉攏幾股布吉斯勢力，擊潰望加錫港市國王哈薩努丁（Sultan Hassanuddin, 1631-1670）後，西里伯斯島上望加錫王國殘餘的勢力潰逃至爪哇萬丹請求援助，並有前往東爪哇集結勢力、以圖再舉者。荷蘭與望加錫雙方的爭鬥，都需仰賴布吉斯人在此海域作為嚮導，而使其勢力隨雙方擴張到中爪哇、東爪哇、小巽他群島等處。<sup>132</sup>

既然西里伯斯四周，並非唐人熟悉的海域，倘若東寧鄭氏的船隻在此地找尋領航員，最可能找的為布吉斯的水手。布吉斯語亦屬馬來語系統，具備「後位修飾法」的特色。例如 bale rakko 即為「乾的魚」，bale 為「魚」，rakko 為「乾」。<sup>133</sup> bale nasu 為「煮的魚」，bale tapa 為「烤的魚」等。<sup>134</sup> 若有人以布吉斯語假借西班牙語 Savalo 來稱呼虱目魚，也會因此形成 Bale Savalo 的字序。再者，十八世紀方志中所記載的「麻」語音，除了現今字典所認定的 moa、ma，如麻豆，麻里即吼之外，也可能發 va，如麻芝干、麻里麻崙。<sup>135</sup> 若為 va 的發音，已與 ba 相當近似。

是以，筆者在此提出以下假說：或許因為布吉斯人在十七世紀時，還未賦予虱目魚統一的稱號（因西里伯斯當時並非產地，也不需大宗消費），而當東寧鄭氏人員航行於此水域時，可能常透過布吉斯水手，收購虱目魚肉品以為口糧。兩

<sup>132</sup> Leonard Y. Andaya, *The Heritage of Arung Palakka: A History of South Sulawesi (Celeb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1), pp. 208-227, Chapter VIII: The Refugees; Gilbert Hamonic, "La commuauté Bugis-Makassar de Surabaya," *Archipel* (Paris) 36 (1988), pp. 59-76; Leonard Y. Andaya, "The Bugis-Makassar Diasporas,"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uala Lumpur) 68: 1 (1995), pp. 119-138.

<sup>133</sup> B. F. Matthes, *Boeginesch-Hollandsch Woordenboek met Hollandsch-Boeginesche woordenlijst en verclaring van een tot opheldering bijgevoegden ethnographischen atlas* ('s-Gravenhage: M. Nijhoff 1875), pp. 209-230.

<sup>134</sup> Anonymous, *A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Bugis, and Malay Languages, Containing 2000 Words*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33), p. 30.

<sup>135</sup> 現今「麻虱目」臺語讀音 Moa-sat-bak，參見陳兼能、鄭明能、鍾以衡編著，《臺灣魚類簡介：食用・觀賞・有毒・稀有種》（臺北：交通部觀光局，1973），頁6；蔣毓英修，《臺灣府志》，頁27，「麻芝干」；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2冊：1641-1648》，索引，頁2，「貓兒干」之「貓」發音為 ba, va，亦即為「麻芝干」之「麻」的發音；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2冊：1641-1648》，索引，頁21，「麻里麻崙」之「麻」則發音為 ve, vo，亦較 ma 接近 ba。

者互動的結果，便產生了像現在這樣，混合了不同語言成分的魚名 Bale Savalo，其後，再進一步被人簡化稱為「麻虱目」Ba-sava。<sup>136</sup>

如從消費的角度來看，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若曾消費虱目魚，可能也是經由小巽他群島附近輸出的魚乾形式，而非鮮魚。而熱蘭遮市的唐人若與馬尼拉唐人互訪，則可能消費過海中撈捕的鮮虱目魚。在荷蘭人統治臺灣的時期，除了北線尾一帶公司曾放寬海岸利用的限制，准許漁民搭寮居住外（如前所述），其他適於從事魚塭養殖的地段，應均不許唐人居住。<sup>137</sup>到了東寧鄭氏時期，由於移入了較前數量更為龐大的定居唐人口，很可能擴張了本地市場的固定鮮魚需求。曾品滄的研究亦指出，清領時代，漁民在夏秋之際為躲避颱風，可能減少出海而降低鮮魚的供應。此時，魚塭所供應的鮮魚，正好能滿足市場的消費需求。<sup>138</sup>此種對養殖魚的市場需求，在鄭氏統治時期，應即已存在。隨著安平、赤嵌人口增加，養殖魚的消費市場持續擴大，而使虱目魚逐漸成為臺灣消費者不可或缺的特色魚種。

## 五、結論：三種臺灣特色海產的確立

十六世紀以來，唐人漁民因追尋烏魚而前往臺灣西南沿岸從事「異地漁業」，繼之，唐商亦由澎湖經過臺灣西南，前往馬尼拉，進入與西班牙人「殖民遭遇」的過程。到了十七世紀，荷蘭人經印度洋、爪哇海域前往東亞，自不會放棄馬鮫鱈此類廣受歡迎的熱帶、亞熱帶食用魚，漸漸地，將食用習慣帶入熱蘭遮市鎮，

<sup>136</sup> 論者或有謂出自臺灣原住民語言。筆者不敏，在臺灣原住民語言中，似未發現有稱魚為 ba、mua 或近似發音者。如西拉雅語稱魚為 kahan，虎尾壟語（Favorlang language）稱魚為 tsi，均頗不相類。參見 Naojirō Murakami, “Sinkan Manuscripts,”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Taipei) 2: 1 (1933), p. 227; Gibertus Happart, “Woord-boek der Favorlangsche taal, waarin het Favorlangs voor, het Duits achter gestalt is,” in W. R. van Hoëvell, ed., *Verhandelingen van het Bataviaasche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Jakarta) 18 (1842), pp. 379-380, Tsi 條。

<sup>137</sup> 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翁佳音曾指出，荷治時期近海漁業抽稅的港（即漁場）中，有一處發音近似「塭仔」者，位於鯧港附近。惟本文指出荷蘭政府因管理唐人漁民，不開放沿岸土地利用，與此推測抵觸。「塭仔」是否也有可能是使用天然地勢構築之魚塭，以粗放方式截留海洋生物畜養者？筆者希望未來海岸的考古調查能夠提供更多線索。參見曾品滄，〈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頁 7，註釋 17。

<sup>138</sup> 曾品滄，〈塭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頁 20。

與唐人市民共享。而荷蘭當局在赤嵌獎勵米糖種植，引進農業移民，也擴大了臺灣本地的烏魚消費市場；同樣地，增進了本地漁業的發展。如此形成的消費市場，引燃了從 1650 年代開始「異地漁業」本地化的動力。

而 1662 年，東寧鄭氏政權取代荷蘭當局後，於 1670 年代展開與萬丹蘇丹的交流，則可能順便引進了東爪哇的虱目魚養殖技術，豐富了大員與赤嵌唐人遷占者（settler）的漁產消費。論究土魷與虱目魚之名稱，一者源自葡萄牙語，由荷蘭人引入；一者源自西班牙語，由馬尼拉唐人引入，反映了當時複雜的時代脈絡。十八世紀之後，在東南亞其他各處，此類魚名稱號，多被當時較為強勢的馬來語系用語所取代，例如土魷被稱為 Tanguigue，而虱目魚則被稱為 Bangos 或 Bandeng。但在臺灣，卻因為唐人成為主要的漁業撈捕者，在語言上，[唐人]較不受馬來語世界的影響，故在魚名的稱謂上，並未同歷東南亞各地此種用語的取代過程。只有「麻虱目」這個稱號，可能在東寧鄭氏人員接納布吉斯語（亦為馬來語系的一支）後，將其泛稱「魚」的詞彙 bale，輾轉借入了漢語之中。

1715 年《諸羅縣志》完成時，編纂者周鍾瑄已經認定，臺灣「多烏魚、多塗鮫、麻虱目」。他又評論臺地烏魚「大數倍，肉白而芳鮮不及」，即味道不及中國沿海撈捕者。相反地，土魷則是「肉細而香美，馬鮫弗及也」，較閩粵所慣食馬鮫的味道更佳。而虱目魚則「鄭經酷嗜」，表示合乎唐人胃口。<sup>139</sup> 他肯定此三種海產為供應府城唐人消費的合格食品。甚至認為，在臺灣，由於鴨多食水中魚蝦，不像雞啄食多種不明的陸地昆蟲，是「蟲毒所積」。所以，食鴨有助於避免風土病。<sup>140</sup>

以上種種對哪些食材有助於在異地保持健康的建議，令人聯想到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時對於食物選用戒慎恐懼的情況。根據美國學者厄爾（Rebecca Earle）的研究，西班牙人受到當時西洋醫學體液學說（humorism）的影響，擔憂、恐懼任何輕微的異種環境影響，或新種食物的攝食，都將改變人體體液構成（complexion），造成墾殖者的衰弱或死亡。<sup>141</sup> 因此，殖民地官員會細心地評估過濾，認定何種美洲食物屬於歐洲人安全可食的食物，並加以登載記錄。他們特別會依據當時流行的體液學說，將此新種食物劃歸到適當的範疇裡。當時許多美

<sup>139</sup> 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諸羅縣志》，頁 367。

<sup>140</sup> 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諸羅縣志》，頁 293。

<sup>141</sup> Rebecca Earle, *The Body of the Conquistador: Food, Race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in Spanish America, 1492-1700*, pp. 52-53.

洲食物（如玉米、馬鈴薯、鳳梨、蕃茄、可可等）儘管大受歡迎，但殖民者多半會建議，不可大量食用，以免積漸變化，無法捉摸。<sup>142</sup>

如同西班牙殖民書寫者細心地將美洲食物按照體液學說，加以分類登載；周鍾瑄對前述三種海產的評價，也導向與中國相關的分類範疇之中。烏魚與土魷，基於其口味，被拿來與中國物產的比較，將之視為中國物產的延伸；只有虱目魚，因其非中國物產，無從比較，只能保留「鄭經酷嗜」的意見，歸納為唐人墾殖者所接受的食物。<sup>143</sup> 但與西班牙墾殖者不同之處在於，周鍾瑄並未擔憂攝食異地的新物種將威脅唐人墾殖者的健康，而是擔憂「瘴毒」將污染雞隻，進而造成不良影響。另其認為豬肉本身可能產生「滯氣」的效果，也會加重本來臺灣地勢低溼「沮洳」的影響，從而致病，應當避免。故他以為，臺地「不宜豬雞」。<sup>144</sup> 在此推論下，這三種臺灣的特色海產，無礙於「瘴毒」，也不像豬肉會引發「積滯」，毋寧是有助於唐人墾殖者健康，成為「盡地利、窮物宜」，而應由當局者規劃利用，歡迎當地墾殖者消費的資源。從這個角度來說，此三種臺灣特色海產，在經歷當時學者以「中國化」的角度歸類登載後，雖然掩蓋了漁業本地化與海產消費的多元脈絡，卻反而保持了其既非完全被視為東南亞漁產，也不與中國漁產完全等同的特色。

---

<sup>142</sup> Rebecca Earle, *The Body of the Conquistador: Food, Race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in Spanish America, 1492-1700*, pp. 127, 144-148.

<sup>143</sup> 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諸羅縣志》，頁 367。

<sup>144</sup> 中國有所謂「毒蟲生瘴」的看法。參見牟重行、王彩萍，〈中國歷史上的「瘴氣」考釋〉，《師大地理研究報告》（臺北）38（2003年5月），頁 13-29。

## 引用書目

- Collectie Aanwinsten 119 (1866 A XII), Beschrijvinghe van de west cust van Formosa de cust van China en Pehu ofte Pescadoves, met haere rivieren, baijen, diepten, droochten clippen, droogten segge cursen, hoochten ende inhammen, alles door verscheijden ervaeren stuerluijden deertoe expresselijck gecommiteert, edurende het gouvernement van E. Hans Putmans ondersocht en bevonden, fos. 269-285.
- VOC (The Archive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 VOC 886, Instructie [van Joan Maetsuijcker] voor den commandeur Balthasar Bort ende den raedt gaende van hier met een aensienelijke scheeps- en krijgsmacht naer de custe van China, omme den Chinesen rover Coxinja allerwegen te vervolgen en hem soo te waeter als te lande allen mogelijcken afbreuck te doen, Batavia (21 Junij 1662), fos. 148-167.
- VOC 1128, Het journael gehouden op den tocht bij den gouverneur Jan van der Burch zedert 26 November 1637 tot 1 December 1637 met een crijghsmacht van 140 zoldaten naer Pangsoija ende Lameij, Pansoija enz. (26 Nov. 1637-1 Dec. 1637), fos. 441-446.
- VOC 1130, Originele missive van gouverneur Jan van der Burch naer Batavia aen gouverneur generael Anthonio van Diemen, Taiwan (12 Mar. 1639), fos. 1405-1417.
- VOC 1131, Dachregister gehouden op de voijagie van de E. Nicolaes Couckebacker, gewesene president ende opperhoofd van 's Compagnies negotie in het rijk van Japan, gaende per de jachten Lis ene Waterlooose Werff in qualite van commissaris aen de coninck van Tonquijn, mitsgaders van daer in deselve qualite tot de visite des Comptoirs ende vordere Compagnies ommeslach tot Tayouan, gelegen op het eijlant Formosa, seijlende van Batavia naer Tayouan, Batavia enz. (16 Junij 1639-7 Dec. 1639), fos. 316-406.
- VOC 1131, Rapport [van Nicolaes Couckebacker]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el Anthonio van Diemen ende de raeden van India, nopende Couckebacker's besendinge naer Tonckin ende gedaene visite des Comptoirs ende verderen ommeslag uijt Tayouan, gelegen op het eijlandt Formosa, on fluitship de Rijp (8 Dec. 1639), fos. 222-315.
- VOC 1145, Missive van den president Maximiliaen Le Maire naer Batavia aen Anthonio van Diemen, Taiwan (9 Dec. 1643), fos. 203-210.
- VOC 1145, Resolutiën bij den president Maximiliaen Le Maire ende den raedt des Casteel Zeelandia geresolveert, beginnende den 1ste Maert ende eijndigende den 9e October 1643, Taiwan (1 Mar. 1643-9 Oct. 1643), fos. 425-468.
- VOC 1149, Vervolgh van de resolutiën des Casteel Zeelandia, Taiwan (20 Mar. 1645-16 Nov. 1645), fos. 870-903.
- VOC 1160, Instructie van Fançois Caron voor den sergeant Gerrit Casman, vertreckende van hier per een Chi-neese jonckje naer de revieren welck om de noordt tusschen Tamsuij ende de landtstreke van de Quataongh liggen, sijnde nu onlanghs aen diverse Chineesen door d' E Compagnie verpacht; waernaer sich in 't uijtvoeren van dese ons ordre sal hebben te gedragen, Taiwan (25 April 1646), fos. 193-195.

VOC 1160, Resolutiën getrocken bij den commandeur Marten Gerritsz de Fries en deselfs raede der vloote, van 17 Maert 1646 tot 2 Augustus 1646, on the Ship Wesel (17 Mar. 1646-2 Aug. 1646), fos. 498-524.

VOC 1163, Instructie van Pieter Antonissen Overwater voor den oppercoopman Roeloff Sievertsz., vertrekkende van hier met een gehuurde Chinese joncke naer de zuijdt van Formosa om de vissers in het vaerwater aldaer te visiteren, waernaer sich in het uijtveren van dien sal hebben te richten, Taiwan (17 Dec. 1646), fos. 343-344.

VOC 1163, Ordre van Antonissen Overtwater voor den corporael van de Adelborsten Hendrick Stalman, leggende met elf soldaten aen Lacquemuij omme des Compagnies visthienden gedurijrdende de maenden December en Januarij te ontfangen als wel meer omme de Chinesen bedriegerijen soo veel doenelijck voor te comen, Taiwan (17 Dec. 1646), fo. 341.

VOC 1182, Resolutiën van Willem Verstegen enz. op de voijagie van Batavia naer Tonquin, Tayouan en Quinam gehouden, 't sedert 11 Maij tot 10 December 1651, Taiwan (11 Mar. 1651-10 Dec. 1651), fos. 127-200.

VOC 1233, Missive van den gouverneur Frederick Coyett naer Batavia aen den gouverneur generael Joan Maetsuijcker, Taiwan (29 Jan. 1660), fos. 696-699.

VOC 1453, Rapport van de ondercooplieden Alexander van 's Gravenbroeck, Jan Tarant et cetera wegens haere negotie tot Aijmuij aen haer hoog edelens tot Batavia overgelevert in dato 8 Januarij 1689, Canton (8 Jan. 1689), fos. 280-294.

Arch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Manila, Anonymous,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Ms. 215.

Nationaal Archief, Den Haag, Compagnieën op Oost-Indië, nummer toegang 1.04.01, inventarisnummer 135.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London, L4309-007.

平澤元愷,《魚名錄》[約為 1784 年未刊文書], 索書號: 特 1-2017。東京: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陳玉箴、曾品滄、李瑞源、吳庭宇,〈台江地區文史資源調查及應用規劃研究(四): 台江飲食文化源流成果報告書〉(2015 年 12 月),《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 下載日期: 2018 年 5 月 31 日, 網址: <https://www.tjnp.gov.tw/FileDownload/Result/20160219115504049606.pdf>。

于景讓

1956 〈臺灣的帝王魚〉,《大陸雜誌》(臺北) 12(8): 235-238。

中村孝志

1997 〈荷蘭時代臺灣南部之鯔漁業〉,收於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 概說·產業》,頁 121-142。臺北: 稻鄉出版社。

1997 〈臺灣南部鯔漁業再論〉,收於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 概說·產業》,頁 143-164。臺北: 稻鄉出版社。

王士禛

1983 《居易錄》。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任韶堂 (Jurafsky, Dan) (著)、游弈庭 (譯)

2016 《餐桌上的語言學家: 從菜單看全球飲食文化史》。臺北: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光任、張汝霖 (著), 趙春晨 (點校)

1988 《澳門記略》。廣東: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朱仕玠

1957[1765] 《小琉球漫誌》, 臺灣文獻叢刊第 3 種。臺北: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江樹生(譯註)

2000 《熱蘭遮城日誌·第1冊:1629-1641》。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2003 《熱蘭遮城日誌·第2冊:1641-1648》。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2011 《熱蘭遮城日誌·第4冊:1655-1662》。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牟重行、王彩萍

2003 〈中國歷史上的「瘴氣」考釋〉,《師大地理研究報告》(臺北)38:13-29。

李元春

1958[1835] 《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李丕煜(主修)、陳文達等(編纂)

1961[1720] 《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2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李嘉亮

1991 《臺灣的水產》。臺北:渡假出版社。

2007 《臺灣魚達人的海鮮第一堂課》。臺北:如果出版社。

周鍾瑄(主修)、詹雅能(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2005 《諸羅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

2006 《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

屈大均(撰)

1983 《廣東新語》。臺北:中華書局。

約翰·尼霍夫(Nieuhof, Johan)(原著),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莊國土(著)

1989 《《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格斯·冉福立(Zandvliet, Kees)(著),江樹生(譯、解說)

1997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下冊。臺北:漢聲雜誌社。

翁佳音

2008 〈國王魚(Kingfish)的故事〉,《歷史月刊》(臺北)248:23-27。

高遠文化(文字整理)

2011 〈賞鯨意外的驚喜:飛魚〉,《漁業推廣》(臺北)296:20-23。

張岳(纂修)、莫尚簡(督修)

1973 《惠安縣志》。臺北:臺北市惠安同鄉會。

曹永和

1979 〈明代臺灣漁業誌略〉,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157-174。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79 〈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補說〉,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175-254。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曹永和(著)、陳宗仁(校注)

2011 《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航》。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梁兆陽（修），蔡國禎、張燮等（纂）

1992 《海澄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莊健隆

2005 《臺灣魚故事》。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連 橫

1963[1957] 《臺灣語典》，臺灣文獻叢刊第 16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郭忠豪

2014 〈技術、品味與土魷魚：大高雄土魷魚的歷史變遷與品饌文化〉，《高雄文獻》(高雄)4(1): 28-54。

陳宗仁

2017 〈唐人與東西洋的研究回顧與展望〉，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21 世紀亞太區域研究挑戰與希望工作坊」。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4 月 28 日。

陳兼能、鄭明能、鍾以衡（編著）

1973 《臺灣魚類簡介：食用・觀賞・有毒・稀有種》。臺北：交通部觀光局。

曾品滄

2012 〈塢與塘：清代臺灣養殖漁業發展的比較分析〉，《臺灣史研究》(臺北) 19(4): 1-47。

陽思謙（修），徐敏學、吳維新（纂）

1987 《萬曆重修泉州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新村出（輯）

1930 《海表叢書：南蠻紅毛史料》，第 2 冊。京都：更生閣。

楊博任

2012 〈荷治時期臺灣的漁業〉。臺南：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良璧（纂修）

1961[1741]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歐陽泰（Andrade, Tonio）（著）、陳信宏（譯）

2017 《決戰熱蘭遮：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蔣毓英（修）

1993 《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鄭維中

2016 〈明清鼎革之際投鄭荷兵雨果・羅珊事略〉，《海洋史研究》(北京) 9: 230-246。

2018 〈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在臺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1622-1636）〉，收於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頁 385-440。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蕭應植、陳景垣（纂修）

1997 《瓊州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韓家寶（Heyns, Pol）（著）、鄭維中（譯）

2002 《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臺北：播種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羅青霄（修纂）、陳叔侗（點校）、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

2010 《漳州府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Alves, Abel A.

- 2011 *The Animals of Spain: An Introduction to Imperial Perceptions and Human Interaction with Other Animals, 1492-1826*. Leiden; Boston: Brill.

Andaya, Leonard Y.

- 1981 *The Heritage of Arung Palakka: A History of South Sulawesi (Celeb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1995 "The Bugis-Makassar Diasporas."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uala Lumpur) 68(1): 119-138.

Anonymous

- 1833 *A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Bugis, and Malay Languages, Containing 2000 Words*. Singapor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Asúa, Miguel de and Roger French

- 2005 *A New World of Animals: Early Modern Europeans on the Creatures of Iberian America*. Al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Azevedo, Milton M.

- 2012 *Portuguese: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rd edn..

Barlow, Edward (author), Basil Lubbock (trans. & ed.)

- 1934 *Barlow's Journal of his Life at Sea in King's Ships, East & West Indiamen & other Merchantmen from 1659 to 1703, Vol. 1*. London: Hurst & Blackett, Ltd..

Bleeker, Pieter

- 1852 "Bijdrage tot de kennis der Chirocentoidei, Lutodeiri, Butirini, Elopes, Notopteri, Salmones, Eche-neoidel en Ophidini van den Soenda-Molukschen Archipel." *Verhandelingen v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Jakarta) 24: 1-32.

Bloch, Marcus Elieser

- 1793 *Naturgeschichte: Der Ausländischen Fische, Vol. 7*. Berlin: Königliche Akademischen Kunsthändlern J. Morino & Comp.
- 1797 *Ichtyologie, ou, Histoire naturell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 des poissons: avec des figures enluminées, dessinées d'après nature, Vol. 10*. Berlin: Chez l'auteur & chez François de la Garde libraire.

Blussé, Leonard 包樂史, Natalie Everts, and Evelien French (eds.)

- 1999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Vol. I: 1623-1635*.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Bontius, Jacobus

- 1694 *Oost- en West-Indische Warande, vervattende aldaar de leef- en genees-konst: Met een verhaal van de speceryen, boom- en aard-gewassen, dieren &c. in Oost- en West Indiën voorvallende*. Amsterdam: Jan ten Hoorn.

Bontius, Jacobus (author), A. Querido (trans.)

- 1931 *Bontius Tropische Geneeskunde (Bontius on Tropical Medicine)*. Amstelodami: Sumptibus Societatis.

Bowring, John 包令

- 1859 *A Visit to the Philippine Islands*. London: Smith, Elder & Co..

Butcher, John G.

2004 *The Closing of the Frontier: A History of the Marine Fisheries of Southeast Asia c. 1850-2000*.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arpenter, William D.

1908 "The Milkfish or Bangos (*Chanos Chanos* Forskal), its Culture in the Fish Ponds about Manila Bay and the Gulf of Ligayen, Island of Luzon." *Bulletin, Bureau of Education* (Manila) 28: 1-23.

Chen, Henry T. 陳大元

2009 *Taiwanese Distant-Water Fisheries in Southeast Asia, 1936-1977*. St. Jhon's, Nfl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

Cheng, Wei-chung 鄭維中

2013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 Leiden: Brill.

2015 "Sailing from the China Coast to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semblances in Chinese and Dutch Sailing Patterns."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EFEO)* (Paris) 101: 289-323.

Chijs, J. A. van der (comp.)

1889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Vol. 6*. 's Hage: Martinus Nijhof.

Earle, Rebecca

2012 *The Body of the Conquistador: Food, Race and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in Spanish America, 1492-1700*.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gan, Brian

2006 *Fish on Friday: Feasting, Fasting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7 *Fishing: How the Sea Fed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ew, Martha and Zeb Tortorici (eds.)

2013 *Centering Animals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Fowler, Henry W.

1936 "A Synopsis of the Fishes of China. Part. VI: The Mackerels and Related Fishes." *The Hong Kong Naturalist: A Quarterly Illustrated Journal Principally for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Hong Kong) 7(1): 61-80.

Gilchrist, J. D. F.

1900 "History of the Local Names of Cape Fish." *Transactions of the South Af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Capetown) 11(1): 207-232.

Godcharles, Mark F. and Michael D. Murphy

1986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Species Profiles: Life Histories and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of Coastal Fishes and Invertebrates (South Florida), King and Spanish Mackerel." *Biological Report* (Lafayette, Louisiana) 82(11. 58): 1-18.

Hamonic, Gilbert

1988 "La commuauté Bugis-Makassar de Surabaya." *Archipel* (Paris) 36: 59-76.

Happart, Gibertus

1842 "Woord-boek der Favorlangsche taal, waarin het Favorlangs voor, het Duits achter gestalt is." In W.

R. van Hoevell, ed., *Verhandelingen van het Bataviaasche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Jakarta) 18: 31-381.

Heeck, Gijsbert

2001 *Een Bunschoter VOC-chirurgijn, 'Daglijkse aantekeningen' van de reis naar Oost-Indië in 1654 door Gijsbert Heeck (1619-1669)*, ed., O. Dekkers. Bunschoten: Historische Vereniging Bunschote.

Heidbrink, Ingo

2014 "Whaling, Fisheries and Marin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 John's, Nfld.) 26(1): 117-122.

Jordan, D. S. and R. E. Richardson

1909 "A Catalog of the Fishes of the Island of Formosa, or Taiwan, Based on the Collections of Dr. Hans Sauter." *Memoirs of the Carnegie Museum* (Pittsburgh) 4(4): 159-204.

Jordan, David Starr and Barton Warren Evermann

1902 "Notes on a Collection of Fishes from the Island of Formosa."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Washington) 25(1289): 315-368.

Kaempfer, Engelbert

1777 *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von Japan: Aus den Originalhandschriften des Verfassers herausgegeben, Vol. I*. Lemgo: Meyer.

Lacépède, Bernard Germain de and Georges-Louis Leclerc Buffon

1800 *Historie Naturelle des Poissons, Vol. 2*. Paris: Chez Saugrain.

Lith, Pieter Antonie, A. J. Spaan, F. Kokkens, and Johannes François Snelleman (comp.)

1906 *Encyclopædi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Vol. 4*.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Lodewycksz, Willem

1915 "De eerste boek van Willem Loede." In G. P. Rouffaer and J. W. Ijzerman, eds., *De eerste schipvaart der Nederlanders naar Oost-Indië onder Cornelis de Houtman, 1595-1597, Vol. 1*, pp. 1-248.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Martens, Eduard von

1876 *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nach amtlichen quellen. Zoologischer Theil, Vol. 1*. Berlin: Königlichen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 (R. v. Decker).

Matthes, B. F.

1875 *Boegineesch-Hollandsch Woordenboek met Hollandsch-Boeginesche woordenlijst en verclaring van een tot opheldering bijgevoegden ethnographischen atlas*. 's-Gravenhage: M. Nijhoff.

Maxwell, C. N.

1921 *Malayan Fishes*. Singapore: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Molhuysen, P. C. and P. J. Blok

1930 *Nieuw Nederlandsche Biografisch Woordenboek, Vol. 8*. Leiden: A. W. Sijthoff's Uitgevers-Maatschappij.

Moree, Perry

2001 *Dodo's en galjoenen: De reis van het schip Gelderland naar Oost-Indie, 1601-1603*. Zutphen: Walburg Pers.

Murakami, Naojirō 村上直次郎

- 1933 “Sinkan Manuscripts.”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Taipei) 2(1): 1-228.

Muscolino, Micah S.

- 2009 *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Nieuhof, Johan

- 1682 *Johan Nieuhofs Gedenkwaardige Brasiliaense zee-en lant-reize: Behelzende al het geen op dezelve is voorgevallen. Beneffens een bondige beschrijving van gantsche Neerlants Brasil, zoo van lantschappen, steden, dieren, gewassen, als draghten, zeden en godsdienst der inwoonders: en inzonderheit ein wijtloopig verhael der merkwaardigste voorvallen en geschiedenissen, die zich, geduurende zijn negen-jarigh verblijf in Brasil, in d'oorlogen en opstant der Portugesen tegen d'onzen, zich sedert het jaer 1640. tot 1649. hebben toege dragen. Door gaens verciert met verscheide afbeeldingen, na't leven al-daer getekent*. Amsterdam: Voor de Weduwe van Jacob van Meurs.

Pigafetta, Antonio

- 2007 *The First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1519-1522: An Account of Magellan's Expedi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ope, Peter Edward

- 2004 *Fish into Wine: The Newfoundland Plant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apel Hill;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Raffles, Thomas Stamford

- 1817 *The History of Java, Vol. 2*. London: Black, Pabury and Allen, Booksellers to the Hon East - India Company.

Rath, Eric C. 拉斯

- 2010 *Food and Fantasy in Early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nard, Louis

- 1754 *Poissons, écrevisses et crabes de diverses couleurs et figures extraordinaires, que l'on trouve autour des îles Moluques et sur les côtes des terres australes: peints d'après nature Durant la régence de messieurs van Oudshoorn, van hoorn, van Ribeek & van Zwoll, successivement gouverneurs-généraux des indes orientales pour la Compagnie de Hollande*. Amsterdam: Reiner & Josue Ottens.

Ryan, Shannon

- 1983 “Fishery to Colony: A Newfoundland Watershed, 1793-1815.” *Acadiensis* (Fredericton) 12(2): 31-52.

Sainte-Croix, Félix Renouard de

- 1810 *Voyage commercial et politique aux Indes orientales, aux îles Philippines, à la Chine: avec des notions sur la Cochinchine et le Tonquin, pendant les années 1803, 1804, 1805, 1806 et 1807, Vol. 2*. Paris: Clament frères.

Salmon, Claudine

- 2014 *Ming Loyalists in Southeast Asia: As Perceived through Various Asian and European Record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Saunders, Brian Greig

- 2012 *Discovery of Australia's Fishes: A History of Australian Ichthyology to 1930*. Collingwood, Vic.: CSIRO Pub..

Schlegel, Gustaaf

- 1888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Chineesche karakters in het Tsiang-tsiu dialekt hoofdzakelijk ten behoeve der tolken voor de Chineesche taal in Nederlandsch-Indië, Vol. 4a*. Leiden: E. J. Brill.

Schooneveld-Oosterling, Judith and Marc Kooijmans

- 2000 *VOC-glossarium: Verklaring van termen, verzameld uit de RGP-publicaties die betrekking hebben op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Seale, Alvin

- 1908 "The Fishery Resources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Part I: Commercial Fishes." *Philippine Journal of Science* (Manila) 3(6): 513-531.

Sicking, Louis and Darlene Abreu-Ferreira (eds.)

- 2009 *Beyond the Catch: Fisherie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he North Sea and the Baltic, 900-1850*. Leiden; Boston: Brill.

Sicking, Louis

- 2003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St. John's, Nfld.) 15(2): 159-162.

Smallwood, Joseph R. and Robert D.W. Pitt (eds.)

- 1984 *Encyclopedia of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Vol. 2*. St. John's, Nfld.: Newfoundland Book Publishers.

Valentijn, François

- 1726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Omstandig Verhaal van de Geschiedenissen en Zaaken Kerkelyke ofte den Godsdienst betreffende, zoo in Amboina, als in alle de Eylanden, daar onder behoorende, van de oudste tyden af tot nu toe, benevens een Fraaye Verhandeling der Boomen, Planten, Heesters, enz. als ook der Land-dieren, Vogelen, Visschen, Horfnkens, en Zeegewasschen, in en by dezelve Eylanden vallende; Mitsgaders een Naukeurige Beschryving van Banda, ende Eylanden, onder die Landvoogdy begrepen, als ook der Fylanden Timor, en Solor, Celebes, ofte Macassar, Borneo en Bali, mitsgaders van de Koningryken Tonkin, Cambodia en Siam, benevens een Verhaal der Zaaken, in de voornoemde Eylanden, en Koningryken, tot nu toe voorgevallen, Vol. 3*. Dordrecht: Joannes van Braam.

Zaneveld, Jacques S. 桑內福

- 1983 *Caribbean Fish Life*. Leiden: E. J. Brill.

**Mullet, Narrow-Barred Spanish Mackerel  
and Milk-Fish:  
Multiple Contextual Developments of Three Certified  
Sea-Food Specialties in Taiwan, from the Dutch Period  
to the Initial Years of Qing Rule**

Wei-chung Cheng

**ABSTRACT**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18th century, “Mullet (烏魚), Narrow-Barred Spanish Mackerel (土魷) and Milk-Fish (虱目魚)” were certified in a local gazetteer as sea-food specialties in Taiwan by the Qing literati.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multiple historical contexts in which each kind of fish developed into a specialty acclaimed by the Chinese settlers, who sometimes shared a common palate with the European colonizers. These multiple historical contexts are: 1) mullet fishery, which explains how Chinese migratory fishery developed into residential fishery under the changing policies of the Dutch colonization and the Zheng Regime that followed. 2) Narrow-Barred Spanish Mackerel reveals how the Chinese name of this mackerel, “to-to”, was derived from “dorado” as a borrowed fish name situated to the European colonial encounter scene. 3) Milk-Fish suggests a hypothesis that the Zheng regime’s activities on the coast of East Java could have introduced brackish water fish-farming to Taiwan thereby initiating Milk-Fish aquaculture. In sum, the Dutch policy of importing Chinese settlers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expansion of local fish consumption and became the agent behi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igratory into residential fishery. The Chinese citizens who lived among the Dutch in Zeelandia town partook of similar fish dishes and even accepted the European names of fish and recipes that were passed down even after the Dutch left. The introduction of brackish water fish-farming from Java was resulted from both above contexts. Although those multiple contexts were ignored by the Chinese literati after Taiwan was incorporated by the Qing, their traces were unintentionally preserved in the local gazetteers for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Keywords:** Mullet, Narrow-Barred Spanish Mackerel, Milk-Fish, Colonial Encounter, Migratory Fishery